

第四篇

政治工作

不同的历史时期内,不同的统治阶级和集团都要向军队灌输适应本阶级本集团的政治思想。清末治军主张“训重于练”,竭力培植忠君思想。民国以后川军各集团则以封建的忠孝荣辱观训兵,以派系笼络部属,以利其据地称雄。蒋介石治军,主张“政治重于军事”,反复宣传“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思想。并在军队中建立政

训机构,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在部队中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治工作以保证革命斗争胜利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之日起,就在部队中创建了革命的政治工作,并把它作为军队的生命线,使部队无论在艰难困苦的战斗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和坚强的战斗力。

第一章 清军治军

清军治军最重要的原则是进行忠君教育,即把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原则“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作为思想教育的基本内容。要求官长择其要旨向兵丁分题讲解,在士兵中树立忠君报国思想。皇帝发布的有关谕旨,将弁必须及时宣读并在操演场所、守卫及值班室张贴,兵丁要熟读背诵,如半年内不能熟记,将对其上级官员治罪。鸦片战争前后,清军日趋腐败,驻防四川八旗兵丁,由于家口日繁而饷额不增,穷困不堪,习于游惰;绿营则普遍滋长钻营取巧、油滑偷惰习气,营务废弛,教育训练多有名无实。^①

咸丰、同治年间,骆秉章、吴棠先后督川,为整顿驻川清军,把湘军首領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和方法引入四川。

先是骆秉章奏准清廷按湘军营制在四川募编勇营,接着吴棠、成都将军崇实又根据清廷谕旨从绿营、八旗中挑选壮健兵丁,分别按照湘军的营规、纪律进行训练。强调募兵选将要“以忠”、“义”为准则。主张训重于练,把思想教育摆在首位,向弁兵灌输封建礼法。强调上下尊卑不可逾越、颠倒,使兵丁做到辨等明威。在训兵中提倡:“用恩莫于用仁,用威莫于用礼”即要求官弁以“仁爱”之心笼络兵丁为统治者效力。在教育方式方法上,要求官弁要用管带子弟的方式教育兵丁,把日常思想教育称为训营规、训家规,告诫弁兵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等。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逐步以封建宗法思想为体,以西方军事技术为用编练新军。1904年颁布《新军制

^① 骆秉章《奏陈四川吏治营务废弛情形摺》,《骆文忠公奏稿》卷一,第1~3页。

略》作为全国普练新军章程。

四川在编练新军的同时,先后开办各种军事学堂为新军培训骨干。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为基。四川武备学堂的“中学”课程即政治思想教育课程,内容有修身、经学、史学、诸子、词章等,强调“教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忠君爱国、敬长尊师之道”^①。在校内设“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和“当今皇帝万岁”牌位,每逢孔子和皇帝圣诞,总办(校长)必率全校教职员司和学生齐集向牌位行大礼(跪拜礼),以示“忠义”。

四川新军的训练,统一以袁世凯主持编纂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为教科书。训与练,强调“训最为要”。训的内容主要是教以忠君报国,诱以功名利禄,引诱弁兵只要忠君报国,即可博功名,致富贵,“高官显秩,无难拾级而升,厚禄重糈,可以操券而获”^②。为了加强军队的训练,《新军制略》还

规定每标内暂设教练员一员,按照统将所定教育宗旨,实施军政教育。

除一般思想教育外,四川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还专门制订《读法》,类似现代军队中的军人守则,官兵人手一册。《读法》共八条:发扬皇威,报效国家,保护同胞,服从长官,和睦同营,勿尚小勇,顾全名誉,说话确实。每个官兵还立下誓约:“读法八条,永远遵守,誓不违背,倘有自干罪戾,愿受军律”。

辛亥革命前夕,清廷危机日深,更寄希望于军队能执干戈卫社稷,使形势转危为安。为此,宣统皇帝特谕旨六条交陆军部颁发全国军队,要求军人:尽忠节、守礼节、尚勇武、崇信义、尚朴素、尚廉耻。但终因悖于时代的发展而归失败。驻川清军同全国清军一样,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而分崩离析。

^① 光绪二十八年(四川武备学堂续订试办章程),中学课程门目表,第31页。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二辑,《清末新军编练沿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书局1978年5月版,第27~28页。

第二章 川军政治工作

民国初,在全国南北长期对峙过程中,川军各部首领竞相据地称雄,部队无政工制度,除进行精神教育外,还利用派系组织为各自争夺霸权服务。北伐战争中,川军各部先后易帜为国民革命军,开始建立政工机构,宣传国民革命,然而,当部队刚刚学唱国民革命军军歌时,又发生了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出现了宁汉分裂。川军各部

又分道扬镳,相互争斗。随着蒋介石势力入川,川军又把反共作为其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抗日战争中,为顺应时局,军队的政治工作内容有所调整,大批川军在抗日爱国旗帜下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牺牲,成为川军最有光彩的历史时期。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其军队的政治工作再次变为反革命的工具。

第一节 派系政治组织

清末四川开始编练新军时,先后开办多所军事学堂,培训新军的基层骨干。辛亥革命后,时局混乱,出身不同学堂的军官,彼此以同学、师生关系结成派系,作为政争的工具。尹昌衡、胡景伊、陈宦、周骏、彭光烈、孙兆鸾、刘存厚等武备学堂师生结成武备系;

刘湘、唐式遵、潘文华、杨森、王瓚绪等陆军速成学堂出身的结成速成系;四川陆军小学学生大半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如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孙震等则结成保定系;李家钰、罗泽洲、陈光藻、张伯言,谢无圻、甘德明、刘莅冰、廖伯帆、廖奇玉等四川军官学

堂、蜀军将弁学堂速成系的同学结成为军官系。

同盟会会员熊克武、但懋辛、喻培棣等曾在日本东斌学校学习军事。1912年,熊克武在武昌召集四川的保定军校学生向传义、吕超、王维刚等教练新军,成为后来川军第五师的基础。1920年,第五师编为第一军,但懋辛任军长,被称为一军系,也称同盟会系。民国初,在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势力对峙中,一军系同孙中山的革命势力接近,其余派系同北洋军阀接近,后来各个派系之间和派系内部,经过一系列的兼并和混战,到易帜为国民革命军前后,形成以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首的川军五大军事集团。

派系是川军各路将领相互纵横捭阖的手段,而在各派系内部,根据斗争的需要,又逐步形成类似党派的某种政治组织,作为聚积骨干、控制部队的工具。

一、武德学友会

1925年,刘湘任四川善后督办时,在重庆组织武德学友会,刘湘部的全体军官均为会员,并创办《武德月刊》作为该会喉舌。1935年,刘湘为了对付蒋介石的分化渗透,在武德学友会内,另组“武德励进会”作为核心,刘湘亲任会长。参加励进会者,必须宣誓:拥护会长,忠于团体,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严格保密,努力工作。1938

年1月,刘湘病逝汉口,该会发出指令“没有武德励进会的命令,所有部队不准调动”。后该会随着蒋介石加强对四川的控制,刘湘集团的分化而结束。

二、学友互助社

1928年3月成立,成员为二十四军系统的军校同学和该军军官,刘文辉亲兼总社主席。以“团结精神,砥励道德,研究学术,联络感情”为宗旨;以“养成高尚纯洁的革命军人,效忠二十四军,维护党国”为目的。学校和师、旅设支社,团设分社,营或独立连设小组。颁布有社训、社条、奖惩条例,创办有《互助月刊》。战争期间组织战地宣传,平时帮助社员解决实际困难和参加民众训练等。“二刘”战后,刘文辉退据雅安,学友互助社随即瓦解。

三、尚志社

1925年10月成立。成员除二十九军官佐外,特许防区内中学校长及教员入社。田颂尧兼总社长,该军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长刘大元为总干事。后又将党(尚志社)、政(驻区工务部)、军(二十九军)合为一体。还在成都设立尚志学校,培训骨干。在三台出版《尚志月刊》,绵阳、阆中、中江、成都各设尚志分社。红四方面军入川后,田颂尧部首先被打垮,尚志社随即解体。

四、眉、保、浮、成同学会

1919~1932年,邓锡侯先后举办过眉州、保宁、重庆浮图关和成都北较

场军事教育团。由四个教育团的毕业生组成同学会,各期均有专人负责联系。这个组织是邓倚重的军事,政治力量之一。

五、五育社、群益社

1931年,杨森部占据广安等县。为巩固杨氏势力,在二十军内成立五育社,以提倡“德智体美群”为幌子,以

“反赤”、“拥护领袖杨森”为目的。1935年夏,蒋介石侦知其口号与“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符,质问杨森,杨被迫宣布解散。李家钰、罗泽洲部的群益社,成立于1926年春,其性质、目的与上述各派系组织基本相同。

第二节 政工机构

1925年7月国民党组建国民革命军时,仿效苏联红军在军、师、团、营、连设立党代表,军、师设立政治部,团、营、连设立政治指导员。川军易帜后才开始建立政工机构,政工制度。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实行“反共”、“清共”政策,在军队公开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被杀被逐,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因而也名存实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蒋介石围剿红军屡战屡败,才又着手恢复、改建军队的政治工作,并实行“党政合并”,军队中的特别党部统一改组为政训处。

1935年,蒋介石派遣参谋团入川,参谋团政训处由“复兴社”领导成员、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总队长康泽担任处长,“复兴社”骨干叶维任副处

长,下辖指导科、宣传科、总务科,机构庞大。参谋团政训处向各军派驻政训分处处长(第二十三、二十九军和罗泽洲部新编第二十三师,由于当时时间紧迫,政工人员不敷,未派遣),向各师派驻政训主任,向各团派驻政训员。康泽将带来的政工人员分别安插到各部,计数百人,从上而下建立国民党的政工机构,作为其反共图川的工具,并加快了对川军的分化和控制。

参谋团入川后,以康泽为总队长的别动总队有四个大队也先后入川。别动队是蒋介石的武装特务组织,其领导骨干都是“复兴社”的特务分子。他们同政训处互相配合,是参谋团政训处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节 政治教育

一、精神教育

川军各部易帜国民革命军前,其教育内容和教材,一是宣传封建礼教思想,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智信仁勇严为德目,加以解释说明,作为军人修身的规矩;二是宣扬中外名人,选择古今中外著名人物,如关羽、岳飞、华盛顿、纳尔逊等作为军人的模范;三是进行时事教育,使官兵思想统一,听从驱使。通过精神教育,要求官兵忠于长官,服从系统,维护派系利益,以便为各部首脑据地称雄,拥兵争霸效力。

二、国民革命教育

易帜后,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政工机构的建立,川军各部政治思想教育开始转向宣传国民革命。刘湘部专门开办军事政治研究所,研究、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北伐战争。杨森部在党代表朱德主持下,在万县杜家花园开办军事政治学校,招收下川东各县中学毕业生400多人受训,培养新的骨干力量;开展部队政治工作,教唱革命歌曲,向广大官兵宣传革命道理;对部队进行整顿,使部队出现新的面貌。刘文辉部易帜后制订的1928年《政治训练大纲》,要求通过政治训练使官佐士兵了解三民主义及国

民革命的政纲政策。大纲规定新兵政治教育的课目有精神讲话、革命军人读本及有关法律知识等;军士政治教育课目有三民主义读本、中国现势及国际现势、各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史、公民浅说等;军官政治教育课目还要加上国民党党史、国民党政纲政策、军人道德以及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等。但该军政治训练大纲又特别指出:“本军特殊精神在无条件服从本军党的政治训练,接受本军党的政治工作,若忽视或拒绝即为本军叛徒”。邓锡侯部也组织教唱国民革命军军歌,学习国民革命军教材《四圣经》。《四圣经》把民主革命的道理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以及革命军人的纪律等,进行通俗概括,帮助官兵提高对国民革命的认识。田颂尧部易帜后,曾颁布实施《训军纲要》。

三、反共教育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阴谋在南昌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为笼络四川军阀,特任命刘湘为南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先后派遣吕超、向育仁等以及一批黄埔生入川,策划拥蒋反共活动。在蒋的鼓励、煽动下,四川的反动分子、国民党

右派分子活动猖獗。刘湘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在制造“三·三一”惨案,血腥屠杀在重庆举行反对英美炮击南京市民大会的革命群众之后,又纠集部队围攻泸州起义军。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6日,川军将领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联名通电反共、反武汉政府,表示誓以全力拥护南京中央政府。至此,“易帜”后的四川军阀投靠了蒋介石集团。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他们又投入了对红四方面军的围攻。

1935年初,蒋介石参谋团入川直接插手川军,改组川军政工机构,开展政治训练,加强了对官兵的反共宣传教育。其主要内容是诬蔑红军和共产党,美化蒋介石。鼓吹蒋是“复兴民族的革命领袖”,要川军服从蒋的调遣,共同反共;向官兵灌输“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信条。蒋介石还亲自到川,举办峨眉军官训练团,轮训川军营以上军官。训练内容主要是打破四川军阀割据观念,宣传“拥护领袖,复兴民族,忠党爱国”和“先安内而后攘外,要安内必先剿共”的思想。由复兴社分子控制的部队各级政训机构,除反共宣传外,便是侦察、监视部队各级军官的思想行动。参谋团改称重庆行营时,行营第三课课长由戴笠兼任,专门搜集军事情报,所有川军都被作过静态调查。各军事学校政训

处,以宣传反共和侦察、监视学员的思想行动为中心工作,对有共产党嫌疑或思想不稳者,即被戴上“红帽子”,予以禁闭、开除或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

四、抗日救国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调整军队政治工作,宣布军队政治工作最高目的在促进全国军队之政治训练,为国家民族而牺牲奋斗;政治工作以士兵民众为中心,要求在军队中巩固纪律,救护伤病官兵,提高士气,实施一般政治文化教育。但又提出“积极巩固国军,防止共党间谍渗透分化,进行兵运,争取反共群众。监视共军,扩展壮大实力”等。

川军在出征前后和在抗日战场上,以各种方式对部队官兵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军人气节教育、爱护民众教育和军队纪律教育。刘湘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川康军民奋起抗日。一二二师临战誓师大会上,师长王铭章号召全师官兵“受命不辱,临难不苟,负伤不退,被俘不屈”。郭汝栋部第二十六师,在行军途中,师、团长经常作动员,提高官兵抗日救亡热情。其部一五二团团团长解固基教育部下:“国战已开,关系存亡,我辈报国之期已到,军人要是怕死,民族何由复兴!”军士刘芳负伤不下火线,第二次负伤后说:“为抗日牺牲,死而无憾”。南京

保卫战中,饶国华率一四五师驻防广德,教育将士“从‘七·七’事变发生起,就渴望到前方杀敌,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八·一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我幸能如愿以偿,奉命出川抗战,引为平生快事”,勉励官兵要牢记部队离川时向蜀中父老兄弟姐妹作出的誓言:“一定要血战到底,收复失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做到胜则生,败则死,不成功便成仁”。邓锡侯不时告诫官兵:“这回到距离四川很远的地方,去对日寇作战,时时刻刻要亲近民众,要和民众打成一片,得着民众的帮助,才容易打胜仗”。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则仿效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一个“四大纪律,十四大注意”。四大纪律是:决心英勇

抗日,服从长官命令,不要人民东西,坚固国军团体。十四大注意是:逢人宣传,说话和气,爱惜武器,不当散兵,整洁驻地,买物公平,借物送还,损物赔偿,不乱拉屎,远让汽车,不嫖不赌,自己洗衣,负伤守纪等。还规定部队在早晚点名时,要集体诵读。

抗日战争胜利后,出川抗战的川军,被蒋介石裁撤、遣散、吞并,所余无几。留守川康的川军部队,仅余刘文辉、邓锡侯两个军和潘文华的几个师。他们在政治上长期摇摆于国共两党之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他们又鼓起了“联共反蒋”的勇气,并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终于在四川解放前夕通电起义。

第三章 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为军队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政治工作保证了红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了长征。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解放军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健全了各级政治工作机构,统一了政治工作领导体制。1954年4月,中共

中央、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为军队政治工作规定了一整套理论、方针、原则、制度和办法。驻川部队政治工作,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级军队、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路线,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发扬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维护了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保证了军队建设和执勤、作战等各项任务的完成。

第一节 党的领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解放军建军的根本原则。党对军队的领导,是通过党在军队各级建立党的组织具体实现的。

一、党委建设

(一)沿革

红四方面军的前身红一军、红十五军等,初建时期实行党委制。1932年12月入川前,即改行政治委员制。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张国焘以中央代表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总揽军政大权,使党的领导作用受到削弱。部队党的系统为各级党务委员会(连为支部),在各该级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领导下,指导党、团建设和部队政治工作。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毛浴镇(通江县内)会议后,党务委员会职权又有削弱,仅限于接收和处分党员,收集党费等工作。

1945年7月,中共“七大”确立恢复古田会议原则,把党委制作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1949年底,部队入川后,西南军区党委成立,并分别成立了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军区党委和西康军区党委。驻川部队营和相当营的单位,设基层委员会或总支委员会。团以上各级设党委会,并设常务委员会。营设教导员、团以上设政治委员,分别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分工主持各级的政治工作。团设政治处,师以上各级设政治部,作为各该级的政治工作机构。随着四川行政区域的恢复,1952年10月,成立四川军区党委。1953年底~1954年初,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重申了军队中党的各级委员会是各该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充分肯定了实行党委制的必要性与正确性。在1954年4月颁布的全军政工条例中,以法规形式把这一领导制度固定下来。

1955年6月,成立成都军区党

委。同年10月,西康军区并属成都军区。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后,驻川部队师和相当于师以上单位的司令部、政治部设部党委,对本机关(部门)的工作实施集体领导,其成员由同级部队党委指定。1970年1月,成立四川省军区党委。1985年后,军、师机关不再设党组性质的部党委,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分别成立党的委员会,领导本机关及其直属队的党组织。

(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四川解放初期,部队任务繁重,工作环境复杂,干部调动频繁,党委机构不健全,加之由于胜利,干部中滋长了功臣思想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因而党委集体领导特别是营、团党委领导有所削弱。1950年8月,西南军区党委第一次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集体领导。同年12月,西南军区召开组工会议,研究部署健全党委制,加强党的领导问题。会后,各军区通过召开党代表会议或政工会议进行传达贯彻。各级党委普遍开展党委制的学习和教育,增强党的绝对领导观念;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党员大会、党代表大会、党委员会、党代表会议的党内领导制度;定期检查、总结党委工作,使党委的集体领导得到了加强和改善。

1954年,根据全国军事系统党的

高级干部会议精神,为正确处理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关系,进一步改进党委工作,西南军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加强西南军区党委的领导和制度的规定》。随后四川军区、西康军区以及四川、西康两省的军分区党委也都相继提出了加强党委领导的工作制度和措施,分别对党委应讨论的主要问题、会议制度、分工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工作检查制度以及党委成员的组织生活作出了规定。这对于贯彻执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发挥首长和业务部门的积极性,克服某些方面的混乱现象,起到了很好作用,使党委工作逐步制度化。

1956年5月,成都军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军区党委和各级党委都基本上贯彻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绝大部分党委是团结的,起到了领导与团结的核心作用。1963年,军区党委书记郭林祥在团以上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就健全党委制总结了经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二者必须紧密结合,不可偏废。党委要把军政首长和各部门置于自己统一领导之下,既要防止各自为政,又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履行他们分工的职权”。1964年3月,成都军区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在《近四年来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中,总结了党委的主要工作,提出要进

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认真贯彻集体领导原则和分工负责制,定期检查总结党委工作,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党的团结,不断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委领导制度遭到破坏和削弱。1978年,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中指出:“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制度,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党委领导”。1979年12月,成都军区政治部召开全区组织工作会议,会议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根据全军政工会议精神,集中讨论了加强党的建设问题。驻川部队各级党委认真贯彻军委指示和军区党委的要求。四川省军区各级党委做到了“五坚持、五保证”,即坚持重大问题由集体研究决定,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坚持讨论中广开言路,坚持正副书记带头发扬民主作风,坚持军政首长按分工负责落实党委决议。从内容上、组织上、会风上、班长的表率作用上、纪律上保证集体领导。

由于坚持党的领导制度,使驻川部队在历次重大转折关头,都能思想统一,部队稳定,始终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三)自身建设

加强学习 结合形势、任务组织党委成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军委的决议和上级的指示,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理论政策水平,使党委“一班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学习内容与干部学习内容基本一致。学习方法有自学、坚持党委中心组定期学习制度,举办读书班等,遇有重要问题的传达学习,则根据需要集中一段时间进行。

健全党内民主生活 各级党委普遍建立了定期交心通气会或民主生活会制度,师以上党委一般每半年一次,会后要向上级党组织书面报告会议情况;对团结不好、集体领导不强的党委召开民主生活会,上级党组织要派人参加,以增强会议的效果;遇重大问题,民主生活会按统一部署进行。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后,驻川部队团以上党委普遍召开了交心通气会,通过学习文件,谈认识,大家畅所欲言,沟通了思想,使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各级党委进一步健全民主生活制度,党委建设得到加强,党的团结有了改善。据1963年对驻川部队57个团以上党委分析,团结不够好的党委由24%下降为10%左右。1981年,四川省军区在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六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全区师、团级党委,人武部党委均召开了党的民主生活会,党委成员普遍对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

内政治生活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对左的思想影响进行了认真清理。这次民主生活会对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团结,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行思想作风整顿 针对党委建设中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结合检查党委工作,对党委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进行整顿。建国以来先后开展过的有:建国初期的“反对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和铺张浪费”整风;1957年的全党整风运动;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71年的“反骄破满”;1975年的整顿“软、懒、散”;1978年后,以拨乱反正,清除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为中心,又分期分批进行了整顿,清理思想,消除分歧,增强团结,并在各级党委中开展了向“经常搞整顿、年年迈新步”的航空兵一师党委的学习活动,涌现了3个“航空兵一师式党委”的团级党委和7个“学习航空兵一师党委的先进党委”的团级党委;1984~1985年的整党中,成都军区党委,军师两级党委和团以下党组织,分三批自上而下的进行了整顿;1986年后,各级党委又结合整党“回头看”,以召开民主生活会等形式,对党风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检查,制定了端正党风、加强廉政建设的措施,各级领导的表率作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

明显增强。

(四)双重领导制度

战争年代,中共中央规定,地方党委是该地区党政军民的统一领导机关。1954年,中共中央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加强军队党委与地方党委的联系的建议》,要求各省军区、军分区及有固定驻地的团以上部队军政负责人应有人参加同级地方党委或列席地方党委会议。1958年,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加强地方党委对军队的领导和密切地方党委同军队关系的指示》,要求部队继续贯彻执行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对军队的双重领导制度。

驻川部队认真执行双重领导制度。军区和军、师、团的主要领导,分别参加或列席省、地(市)、县(市)党委会,及时汇报部队的工作情况,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和监督。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作为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门,由同级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军队党委第一书记;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武部,各有一名主要领导参加同级地方党委的常委会。50年代中后期,成都军区领导干部有3人参加省委,其中2人参加常委,1人参加省监委。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军区主要领导职务,军区的中心工作,都能纳入省委的议事日程。军区还定期或不定期向省委请示汇报工作,接受和服从地方党委领导,军政关

系十分密切。7788部队自觉尊重地方党委的领导,制定了《关于正确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三十条规定》,成都军区政治部转发全区部队参照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总政治部指示,驻川部队重新制订了服从地方党委统一领导,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公约、守则、措施和规定,双重领导制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二、支部建设

连队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是连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在基层落实的根本保证。在驻川部队政治工作中,把抓基层党支部建设,始终放在重要地位。

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把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作为重要工作。一是经常派出巡视员进行考察和帮助,总结推广经验,对落后支部及时进行整顿。二是训练骨干。除彭杨军政学校政治队培训支部工作骨干外,各军、师政治部还以《连队指导员须知》、《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指导员暂行条例草案》和《支部组织及其工作》等为教材,不定期举办基层政治干部和党员训练班。在1934年“反六路围攻”期间,红三十军政治部举办了党务训练班,各团政治处到连队巡回开办短期党员训练班。三是做好党的发展工作。由于战斗频繁,党员一般占

伤亡总数的50%，有的达80%。及时把优秀分子吸收入党，对稳定部队，保持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四是建立党课制度。以方面军政治部编印的《党员须知》为教材，政治机关经常派人到连队上党课，组织讨论，解答问题。对党内的文件，均编印授课大纲，指定专人宣讲，使党员及时了解当前的形势及党员的任务。

四川解放后，部队新成份增加，所处环境及担负的任务发生了很大变化，党支部建设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十分注重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在支部的集体领导方面，要求处理好个人与组织、书记与委员、党的领导与行政领导的关系，帮助解决某些军事干部对支部“一元化”领导的抵触情绪和政治干部认为“一元化”就是化到一个人身上的错误观念，以及干部支委以个人意见代替支委会决议的问题。强调支部要抓大事，克服会议、汇报多，时间长，而又不解决问题的现象。为加强支部的集体领导，川北军区对分散执勤的分队，采取成立党支部的形式：即有党员3人以上的编党小组；5人以上的指定一名支委负责；够7人的组成支部，使党的领导作用不致削弱。在党的发展上，针对部队新成份多，党员数量减少后一度出现的突击发展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关于“军队今后一个时期着重点是巩固党，发展团”的指示，从

1951年春起，暂停发展，着重于巩固提高。1952年，总政提出“积极而又慎重”的发展方针后，驻川部队恢复了党的发展工作，加强培养、考察，严格入党手续，提高了党员质量，党群比例逐年上升。1952年，西康军区党员占总人数的19%，到1954年上升到27.4%。在党的教育上，坚持每月一次的党课制度，组织党员学习党的纲领、民主集中制、共产党员标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党员修养等内容。各军区、军分区、部队还采取多种方式举办短期训练班，对支委、小组长和党员进行轮训。据驻川某军统计，一年内军直开办党训班3次，共训党员236名；该军某师办党训班13次，共训党员1399名（支委56名，小组长409名，党员934名）。1954年8月，西南军区政治部经过调查分析，针对连队党支部存在的问题发出《关于整顿支部工作指示》。这次整顿按照连队支部工作条例的要求，以加强支部集体领导和党员联系群众为重点。各部队于年底前先整顿一批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后，1955年对全区党支部普遍进行了整顿。

1956年又把加强支部的领导与保证作用作为支部建设的中心问题加以解决。1957年2月，成都军区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加强支部建设的4条经验：（1）健全组织，每年老兵复员后，根据党员分布状况及时进

行调整,保证班有党员、排有党小组;(2)加强集体领导,发扬党的民主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3)改进领导作风,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特别要加强对共青团、革命军人委员会和连队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民主的领导;(4)加强执行各项任务中的思想领导,开展群众性的思想工作。在党的教育上,从1957年起,对支部书记的轮训改由师和分区负责。军区政治部每年根据部队担负的不同任务,分别召开支书联席会,采取研究、总结工作的方法,以会代训提高支部书记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支委、小组长,以营、团为单位进行轮训。党员通过党课进行党的章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党的发展工作,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总政关于发展党员应以技术兵和知识分子为主的精神,各部队党组织开始重视知识分子和技术兵的发展工作,并做到年年有计划,月月有工作,认真考察教育,严格入党手续,使发展工作转入经常化。1961~1965年,全区发展党员32000名,团员31000名。至1965年,98%的排有党小组,95%的班有党员。各级党组织每年都以较大的力量,抓党支部的检查整顿。1960年7月~1961年1月,全区整顿党支部1006个。1962年以后,每年都整顿一批,对问题较多的党支部还进行改选或调整。1963年,驻川部队认真

贯彻总政治部总结概括的《党支部建设的十条经验》,全区基层支部建设又进一步加强。

粉碎“四人帮”后,驻川部队各级党组织,从抓思想教育入手,于1977年进行了共产党员必须做到“七个懂得”的教育(即:要懂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党的建设问题上造成危害的严重性;要懂得立党为公,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允许结帮营私这个基本道理;要懂得党内不允许组织派别和秘密集团这条党规党法;要懂得党的集中领导和党的组织纪律的重要性以及无政府状态的危害性;要懂得共产党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要懂得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允许向党向人民伸手要官要权;要懂得共产党员必须遵守“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做到党章规定的五项基本要求)。1979年后,又以党章修改草案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为教材,进行党规党纪教育,并分批轮训党员和党支部骨干。四川省军区到1980年底,共轮训党员17058名,占党员总数的92.3%。参加轮训的团以上干部党员,占总数的91.9%。1983年,各部队又普遍对党员轮训了一遍。与此同时,各级党组织每年都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帮助基层党支部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并及时调整和整顿后进支部。1983年中央军委提出大抓基层之后,

驻川部队分别作出决定,制定计划,把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作为加强基层建设的关键来抓,以后又召开基层建设经验交流会,树立一批基层建设的先进典型。1984年,各级结合学习整党文件,分期分批地对基层党支部进行了全面整顿。据56005部队1984年底的调查分析,经过整顿后,战斗连队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好的和比较好的占97.4%,差的只占2.6%。各部队还开展了“创先进党支部,争当优秀党员”活动,每年都评比、表彰一批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使党支部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三、整党整风

1950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西南局及西南军区党委随即发出了《干部整风指示》。这次整风,先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开始,逐次展开到营以下干部,采取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党代表会议,检查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或以整风队的形式进行。整个过程大致分两个阶段:前一段以整顿领导作风,纠正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正在滋长的和平麻痹、贪图享乐的思想为主;10月以后,在干部中,结合形势与任务,以整顿与提高战斗意志为主,并检查领导作风和各种不良倾向。通过整风,检查了违反政策纪律、贪污腐化等不良倾向和官僚

主义作风,清理了错误思想,加强了政策纪律观念,增强了斗志,对部队党的思想、作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8日,总政治部召开全军整风座谈会。13日,成都军区党委召开党委书记联席会议,决定军区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整风。在整风后期,全区又进行了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家属还乡、增产节约、调整关系、改进作风、干部参加劳动等一系列整改活动。但由于整风运动中途转为反右派斗争并严重扩大化,伤害了一批好干部,产生了消极影响。

1959年7~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连续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之后,按照军委和总政治部的统一部署,在全军干部中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和整风运动。成都军区党委于10月5~30日召开了军区党的四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团以上干部1000余人。各军、师(军分区)、团级单位于11月上旬~12月中旬,相继召开了党的干部会议。据统计,全区正式参加会议的干部达到应参加干部总数的95.2%,未正式参加会议的干部,也限期进行了补课,基本做到一人不漏。运动中少数干部被划为“重点”进行批

判,有的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党内或行政处分。这次“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打击了一批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教训十分深刻。1962年进行了甄别平反,但很不彻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作了彻底否定。

粉碎“四人帮”后,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成都军区各级机关和部队从1976年10月~1978年,开展历时两年的揭、批、查运动。运动中,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反党乱军、祸国殃民的罪行,清查了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运动后期进行了历时半年的“一批三整顿”(揭批“四人帮”,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全区共派出54个工作组226人(其中军以上领导24人,师级35人),深入各单位具体帮助指导。各级党委召开会议,弄清贯彻执行党的路线上的是非,

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并调整了班子。通过“一批三整顿”,对保持部队的团结和稳定,恢复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对有些问题看得过重,批判过头。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驻川部队各级党组织,按照成都军区党委的部署,从1983年底~1985年从上至下分三批进行整党。通过整党,进行了党性、党风、党纪教育,进一步清理了“左”的思想影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加深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据成都军区对全区师级单位的分析,完成整党任务好的占67%;基本完成整党任务的占30.6%。没有达到要求的单位都进行了补课。

附:

平反冤假错案

成都军区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粉碎“四人帮”的初期即开始进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工作。各级党委加强领导,建立落实政策的专门机构,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与组织工作,对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清查处理。到

1981年底,大量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对“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致死的给予平反昭雪;批判、处分错误的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或减轻或免于处分;原结论不当的给予修改纠正或撤销或不作结论;不应资遣、复员的改为复员、转业或退休;对职工及家属中遗留的某些问题,也按政策逐一落实。对此期间判处的各类政治刑事案件,

全部进行了复查。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重大案件进行了甄别。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作了平反；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中

右”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作了纠正；对81名国民党军起义人员的申诉进行了认真处理。

第二节 政治教育

驻川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是按照全军的统一部署，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和部队的中心工作，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指战员的头脑，以实现党对军队的思想和政治领导，团结全区部队为完成各项任务，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而努力奋斗。

一、红军政治教育

红四方面军在川期间，部队政治教育由团政治处定出教育计划，利用休整和作战间隙，由连队政治指导员组织实施。以方面军政治部编印的《红军战士读本》、《红色战士必读》、《红色战士丛书》等为基本教材，主要内容有：马列主义基本常识、帝国主义的罪恶、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中国的前途、共产党的十大政纲、红军的三大任务、红军须知等。教学方法要求通俗浅显，具体生动，由实际到理论，采用问答式、启发式和组织讨论。干部除参加部队的政治学习外，还抽调部分干部进入方面军学校培训，主要内容

有马列主义理论常识，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红军的性质、任务，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和民族政策等。

二、建国初期的政治教育

建国后，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需要，驻川部队的政治教育开始走向系统化、制度化，经常化。

(一)基本政治理论教育

从1951年起，干部教育按职务和理论基础分别编为初级、中级、高级班。初级班学“政治常识”，然后升入中级班；中级班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列宁主义基础”、“党的建设”的顺序，依次进行；高级班选修“毛泽东选集”、“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思想方法论”等。要求在三、五年内，学完上述内容。学习方法：初级班主要是上课，结合自修讨论；中级班，上课与自学并重；高级班以自学为主。分散作战和执勤部队的干部，由师和军分区举办政治轮训队，每期2~3个月，学一门课程。1953年后，又

在一般干部中进行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历史唯物论”教育,在高级干部中进行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历史唯物论”教育。1956年,成都军区根据总政治部指示,对干部理论学习内容,重新作了调整,规定尉级军官三年学完“政治常识”等三门课程;校级军官五年学完“中共党史”等五门课程;少将以上军官两年内学完“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两本书。当年全区即培训300名专兼职理论教员和辅导员。各部队通过举办夜校、训练班、干部理论集训等多种方式,培训干部14084名。士兵政治教育,建国初期首先进行阶级教育,树立阶级斗争观点。在此基础上进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新英雄主义教育与时事政策教育。1956年后,主要学习总政规定的士兵政治教育基本课程。

(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教育

1953年以前,结合地方和部队各阶段的中心任务,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项教育,使干部战士认清地主阶级的本质,积极拥护、支持、参加土地改革;提高革命警惕,克服和平麻痹思想;树立必胜信心,坚定永远是战斗队的思想。保证部队剿匪、战备训练、筑路施工等各项任务的完成。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教

育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驻川部队,采取办集训班和召开干部会议等形式,培训了教员和骨干。1954年,在全区部队中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基层官兵学习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关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学习提纲》和总政治部编发的《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课本。中、高级干部还学习中央领导的有关文章、讲话,学习列宁、斯大林关于过渡时期的论述。在理解总路线实质的基础上,强调联系实际,克服居功骄傲,停滞不前,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思想倾向,逐步实现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转变,树立起“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一切为了现代化革命军队建设”的观念。

(四)四项制度改革教育

从1955年起,全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军队实行军衔制,军官实行薪金制和给对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现役军人颁发勋章等四项制度。随着四项制度的逐次实施,在驻川部队中深入开展了四项制度教育。四川军区先后召开了两次党委扩大会和三次干部工作会议进行部署。整个教育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义务兵役制和薪金制教育;第二阶段转入以军衔制为主与颁发勋章的教育。由于新制度的实行,老兵复员、新兵补入和干部调

级、定衔,涉及的实际问题较多,各级领导注意把思想教育同实行各项制度的具体步骤、规定、措施结合起来,并对不同类型不同思想的人,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从而保证了四项制度的顺利实行。成都军区共评定将官43人,校官1121人,尉官15847人,准尉3142人。授予勋章者,计现役军人1549人,勋章2541枚。完成了1955年度首批131250名义务兵的征集和老兵复员退伍的任务。

(五)社会主义教育

为适应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需要,从1957年11月陆续开始在全区部队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接受教育的有550个连队,机关、学校也同时进行。这次教育,是在官兵中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群众性自我教育运动,整个教育至1958年上半年结束。通过教育,增强农业集体化意识,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促进了部队平叛等各项任务的完成。

三、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教育

这一时期政治教育的显著特点是贯彻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深入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和学习有时代特色的先进典型活动,同时结合形势、任务和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各项宣传教育。

(一)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

50年代末,成都军区部队就已经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列入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1960年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下达后,各部队联系中国革命的斗争史、军史、连史、家史、个人成长史,反复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激发广大干部战士的学习热情。建立在职干部学习制度,普遍开办毛泽东著作学习班,分期分批轮训干部。师以上单位,每年都举办1~2次干部读书班。学习内容主要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论述;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理论;艰苦奋斗的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思想意识和道德修养;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等。团以上干部和理论文化较高的干部,要求多读一些原著,学深一些。高级干部还要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士兵政治教育也要选学毛泽东著作。学习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抓住带有普遍性的基本问题反复学。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备课讲课,并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采取树立样板、典型引路、评比、讲用等方式,不断掀起学习热潮。成都军区和各部队团以上单位,曾多次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力宣扬和表彰先进。但后来,由于林彪提倡“背警句”、“走捷径”,使学习毛泽东著作出现了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

(二)“两忆三查”教育运动

从1960年冬开始,根据总政治部指示,成都军区部队在连队中分批开展“两忆三查”教育运动。先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学习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等文章、兰州部队的经验和上级有关指示,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教育的意义、目的、步骤和方法。接着进行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展开。具体做法分为三步:第一步忆阶级苦;第二步忆民族苦;第三步进行三查(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总结提高。通过“两忆三查”,使广大干部战士再一次受到生动实际的阶级教育和传统教育,增强了斗志,为战胜国家当时面临的经济困难,完成各项任务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三)紧急战备教育

1962年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成都军区根据总政治部指示,进行紧急战备动员。在此期间,召开各种规模和不同形式的控诉会,控诉美蒋的罪行,激发官兵的阶级仇恨,提高战斗意志。广大官兵以上前线杀敌立功为荣,准备退伍的老兵,主动申请超期服役;有当“和平兵”思想的新战士,坚定了斗志;有的干部推迟了婚期;休假探亲的均提前归队。全区抽调3700名老兵和180名技术干部支援前线,都愉快地服从分配,走上战斗岗位。1965年,当美帝扩大侵越战争,威胁到中国安全时,根据总参、总政指示,驻川部

队又开展了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战备教育。各级党委以非常时期的姿态投入战备工作,领导干部亲自讲形势,传经验,并利用一切宣传工具,使教育搞得声势浩大,生动有力。干部战士纷纷写决心书、请战书,要求第一批开赴抗美前线。野战部队的家属普遍做好“三准备”(准备送亲人上前线、准备参加支前、准备搞好生产带好孩子)。部队开展战前训练,落实组织和物资准备,完善战备制度。在短短半个月內,全区部队即处于待命出发状态。

(四)学雷锋、学“南京路上好八连”

从1963年起,成都军区部队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广泛开展学雷锋和“好八连”活动。为此,军区政治部专门发出通知。在5月召开的成都军区首届共青团员代表会议上,又作出《关于在全区青年中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地开展向雷锋同志和好八连学习活动的决议》。各部队通过报告会、座谈会、墙报、黑板报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教育。7788部队开展“雷锋是怎样成为一个伟大战士的?”大讨论。使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好八连”艰苦奋斗的作风在部队中深入人心。学雷锋、做好事,关心集体蔚然成风,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全区团以上单位先后树立个人标兵115名,集体标兵30个。

在全区范围内宣传和树立了4个“好八连”式连队和战斗英雄陈代富、曾盛荣、谢世清等3名雷锋式人物。随着学雷锋、学“好八连”活动的不断深入，对部队建设起到很大推动作用，并产生深远影响。

(五)连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和总政治部的指示为依据，以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为重点，从1963年6月开始至10月中旬基本结束。全区基层连队和相当于连的单位分三批进行。教育中反复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普遍开展忆家史、村史、连史，请老红军、老首长、老干部作报告等活动。有的连队还组织参观重庆国民党军统集中营，大邑“地主庄园”等阶级教育展览。在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展对“农村自发资本主义势力(指‘三自一包’和单干风)和城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批判，并联系个人实际，从思想、作风等方面对照检查，克服斗志衰退、贪图享受、厌倦艰苦紧张等思想情绪。从稳定部队出发，这次教育坚持了以正面教育为主的方针和“六不”(不追、不逼、不斗、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政策。

这一时期，成都军区部队还不断进行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1958年进行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中心内容的教育和开展反

“教条主义”、反“单纯军事观点”的教育和斗争。1960年，开展“三反”(反官僚主义、反贪污、反浪费)和整风运动，进行正确对待国家暂时经济困难和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教育。1962年进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教育。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连续数年在部队中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以及“突出政治”的教育。这些教育，有搞得比较好的，对提高部队思想认识、团结一致，战胜困难，搞好战备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多数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给部队思想建设带来消极影响。在随后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中，突出政治成为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成为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政治教育被导入错误的轨道。

四、新时期的政治教育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决策，并逐步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此部队政治教育转到正确的轨道。

(一)重点转移的教育

各部队认真传达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刻认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伟大意义。组织各级干部学习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开展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

成都军区于1979年先后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师以上干部会议、军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学习汇报会；军(省军区)、师(军分区)、团分别举办党委书记理论政策学习班、干部学习班、连队基层政工干部集训班。仅1979年，四川省军区共办学习班54期，参加2164人。集训连队正副指导员学习班两期，参加学习者近300名。经过深入学习讨论，对国内阶级状况、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逐步端正了思想路线，加深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和贯彻执行的自觉性。

(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

1979年3月，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驻川部队立即进行传达学习，各级政治机关讨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做好新时期政治思想工作问题。1981年4月，总政治部要求全军团以下部队系统地进行一次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成都军区于同年5月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进行部署。各部队抓了试点和先行连队。教育中，以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发的《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参考材料》为教材，逐项学习，并把宣讲革命道理与运用各种生动实际的材料结合起来，采取参观访问、社会调查、请人作报告、宣传典型等方式，把教育搞得生动活泼，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清除“左”的思想影响教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

贯彻，军队建设中“左”的指导思想得到纠正，但系统地清理“左”的思想影响，经历了一个过程。1981年下半年，各部队学习中共六中全会决议，团以上单位检查总结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情况。1982年冬~1983年春，组织学习中央有关文件，联系实际，自觉清理本单位和个人“左”的思想影响。1984年7月，又在全区部队开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的教育。这次教育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在团以上党委和机关中展开；第二步由领导以讲课形式，对基层干部战士进行教育。通过学习，使广大干部战士澄清了种种模糊认识，认清“左”的危害，自觉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四)理想、纪律教育

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对部队思想、作风建设带来的消极影响，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70年代末至80年代，各部队反复进行理想、纪律教育。1978年，在普遍进行教育的基础上，发动群众，上下结合，对部队的组织纪律进行整顿，纪律状况大为改观。1980年7月，为贯彻全军政工会议精神，成都军区在经过试点后，召开革命人生观教育现场会。随后，全区部队相继开展人生观教育，针对干部战士的现实思想，着重抓幸福观、苦

乐观、荣辱观、恋爱观、生死观的教育。开展怎样对待军人的“得与失”，怎样看待“当兵吃亏”等问题的专题讨论，帮助干部战士树立远大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年8月，成都军区制定《部队青年道德修养守则》十条，颁发部队实行。1982~1983年在部队中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教育中，始终把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目标（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政策（党的现行政策）——岗位（个人工作岗位）——现实思想联系起来学习理解，使干部战士立足本职，自觉为实现远大理想而奋斗。1987年后，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各部队又进一步加强以理想、纪律为重点的政治思想教育，引导指战员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道德观，提高严格执行纪律的自觉性。

（五）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1978年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后，驻川部队开始恢复系统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团以上干部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共党史，营以下干部选读毛泽东著作和马列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980年组织团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营以下干部学习总政治部编印的《政治常识课本》。1982年，根据总政治部宣传部要求，部队重点学习毛泽东哲

学著作。1983年，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加强全军干部科学文化政治理论教育的决定》，规定1990年前，凡45岁以下未系统学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团以上干部和政工干部，都要学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四门课程；军事、后勤和专业技术干部，要学完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和建设三门课程。各部队认真贯彻总政治部规定，制定了规划和措施。四川省军区采取加强轮训，建立健全政治理论教学机构，充分发挥教导队作用，机关干部的学习与自修大学结合进行等方法，开展教育活动。到1989年底，提前一年完成各类干部政治理论教育任务。战士政治教育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政治教育大纲》进行。在按纲施教中，各部队摸索出一些办法：在教学的组织上，比较集中的单位采取“由团组织备课、营组织施教，教员集中使用，授课循环进行”；在教学方法上，改变注入式，坚持民主讨论式的方法；在教学考核上，采取评定政治课作业等方式，对提高战士政治教育质量起到了良好作用。在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中，各部队把学习《邓小平文选》作为重要内容，着重学习邓小平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论述等内容，并和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

起来,和军队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第三节 经常性思想工作

经常性思想工作,是针对干部战士各种现实思想问题,随时进行的教育疏导工作,具有很强的时效性、针对性和群众性。它贯穿于各项工作和日常生活之中,与集中系统的政治教育互相联系,互相补充。驻川部队把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作为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分析研究,及时总结推广经验,使经常性思想工作做到及时发现,切实弄清,正确解决。

一、掌握思想变化发展规律

1954年10月,西南军区发出《关于思想情况研究与报告办法通知》,要求经常了解和研究本单位的思想情况,并规定团以上部队每季度进行一次有系统的分析研究(执行重大任务或思想转变的重要关节应及时研究),提出思想领导的方针与教育方法。此后,调查了解部队思想情况,分析研究思想变化发展规律,在驻川部队中形成制度。6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成都军区政委郭林祥亲自负责部队思想动向的调查,并要求驻川部队各级领导要有人抓此项工作;规定连队党支部半月研究一次,营以上党委和团以上机关

每月研究一次,师以上政治机关每季度向军区写一份典型单位的思想调查报告。通过调查研究,切实掌握部队思想动向,抓住苗头,把工作做在前面。1965年12月,军区又强调要着重抓好政治思想上的大事,抓好带普遍性的倾向,摸清部队思想变化规律。这一阶段,各级政治机关均以主要精力帮助连队抓好现实思想,“总结在各种情况下如何抓好活思想和解决这些活思想的经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部队在调查研究思想情况中,特别注意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准确掌握新时期干部战士思想发展变化的新特点。由于摸清了部队的思想情况,有了思想工作主动权,使经常性思想工作有的放矢,及时有效,许多问题在萌芽状态就得到解决。

二、围绕中心开展工作

部队的现实思想,随着形势、任务和各种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驻川部队的经常性思想工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中心内容。建国初期,针对部队在胜利形势下出现的斗志松懈等各种现实思想,经常性思想工作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将革命

进行到底为中心,引导干部战士树立永远是战斗队的思想。50年代后期,突出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树立共产主义思想。60~70年代中期,强调“兴无灭资”改造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1964年3月,中共成都军区第三次代表大会总结部队经常性思想工作情况时指出,干部战士经常遇到也是必须解决的有六个基本问题:一是阶级斗争观点;二是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思想;三是艰苦奋斗的传统;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五是思想意识与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修养;六是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成都军区在总结1965年政治工作经验时又指出“以毛主席著作作为武器,从提高阶级觉悟入手,解决连队的现实思想问题,抓好活的思想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80年代以后,经常性思想工作是围绕“四有、三讲、两不怕”(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树立革命人生观,引导干部战士成为热爱祖国,安心服役,勤奋学习,艰苦奋斗,英勇对敌,见义勇为,关心集体,遵守纪律,文明礼貌,正当恋爱^①的新一代军人。

三、建立骨干队伍

驻川部队十分重视贯彻思想工作

中的群众路线,建立以连队党支部为核心,党团员为骨干的群众性思想工作骨干队伍,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性思想工作。每当连队执行一项新的任务或遇到重大问题,党支部都按先党内后党外进行深入动员教育,先做好骨干的工作,把党员、团员、正副班长、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委员以及俱乐部活动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支广泛的思想工作队。此外,连队还选择政治觉悟高,有活动能力的战士,加以培养,教他们做思想工作,交给具体任务,作为连队思想工作骨干。通过这支骨干队伍,在执行各项任务中广泛开展谈心活动、“一帮一”“一对红”的互帮互学活动,使思想工作渗透到每个角落。0018部队喷火连在做后进战士的思想工作中,提出“一人掉队全连帮”,运用思想工作骨干,发动群众从思想上、生活上关心帮助,使后进战士很快得到转变。各部队还重视发挥军事、后勤、技术干部做思想工作的作用,使经常性思想工作渗透到训练、施工、执勤等各项任务中。还注意把部队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结合起来形成合力,使群众性思想工作更生动活泼。

四、坚持疏导方针

驻川部队在经常性思想工作中始

^① 1980年8月成都军区制定《部队青年道德修养守则》。

终强调解决现实思想问题,只能耐心说服教育,疏通引导,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克服各种错误思想认识,不能靠压服。虽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和文化大革命中,曾出现过“抓辫子、扣帽子”无限上纲的不正常现象,但很快得到了纠正。在说服教育中普遍采用的方法有:既讲大道理,也讲小道理,用大道理管小道理,把革命利益

与个人利益统一起来;从实际出发,因人施教,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以表扬为主,宣扬先进树立正气,调动干部战士的积极因素,自觉抵制各种歪风;将做思想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第四节 战时政治思想工作

一、红四方面军战时政治思想工作

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通江毛浴镇召开党政工作会议,强调加强战时政治思想工作,激发指战员不怕艰苦,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战前结合形势和任务动员,树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敢打必胜的信心;战中,各级干部和共产党员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及时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鼓动,激励斗志;战后,开展群众性的战评活动,表彰先进,宣扬典型。

在反围攻开始阶段,通过动员教育,使指战员深刻理解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作战方针;在广(元)昭(化)战役、陕南战役、嘉陵江战役前,各部队都进行方面军制定的“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十六字训词教育,使部队认识统一,行动一致,

勇于牺牲,百折不回,为取得战役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当部队穿越雪山草地时,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开展思想、体力互助,帮助老弱病残的人员背枪支,鼓励大家紧密团结,互相帮助,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战胜千难万险,顺利越过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

1935年12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召开政治工作会议,系统地总结了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并作出《战时政治工作的决议》,特别强调战时必须进行充分的宣传教育,提高杀敌勇气,灭敌决心和胜利信心;教育干部战士维护战场纪律,坚决执行命令;做好巩固部队和争取敌军的工作等。

二、进军大西南和剿匪战斗中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解放四川、西康过程中,部队的思想教育,首先是进行以大进军为中心内容的动员,教育干部战士认清向全国大进军,解放全中国是解放军的历史使命,引导指战员正确认识和对待革命利益同个人利益的关系;针对大进军具有高速度战略追击的特点,教育部队发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敢于远距离、大迂回,先围后打,用最快速度断敌退路,全歼敌人;针对大进军是一个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特点,教育部队树立全局观念,正确处理同兄弟部队、同地下党、游击队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做到密切配合,互相支援。加强政策纪律教育,特别是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要以部队的模范行动教育群众,扩大影响。教育部队学会军政兼施,做好瓦解敌军工作。此外,还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开展杀敌立功活动,抓好以思想、体力互助为重点的群众性思想工作,使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行军、作战的各个环节。

在50年代初期的剿匪作战中,针对作战的特点,深入进行艰苦奋斗,肃清匪患,巩固人民政权的教育;进行坚持军事打击、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三者结合的剿匪方针政策的教育;还针对各个作战阶段部队的主要思想倾向,及时进行教育,使部队思想适应剿匪作战发展变化的要求。在教育方式

上,除正面教育外,还实行教育与整顿相结合的方法,提高教育的效果。在剿匪作战部队高度分散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加强党组织建设,健全党的生活与党的教育,使党员成为带领群众完成任务、执行政策、遵守纪律、反对不良倾向的模范。同时开展新英雄主义立功运动,加强互助组工作,发扬互相规劝,互相勉励,互相比赛的作风;严格行政管理,避免某些不良倾向的发生。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加强具体帮助,提高基层干部政策纪律观念和单独完成任务的能力。为剿匪作战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思想保证。

三、改造起义、投诚部队

解放战争中的大西南围歼战,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共歼灭国民党军约90万人,其中用和平方式解决的国民党军队“是最大之数”^①。川、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除被俘和投诚外,先后宣布起义的约40余万人。

起义部队中有蒋介石嫡系部队、地方系部队和游杂武装三种类型,各有特点:蒋介石嫡系部队中,不少人对蒋仍有幻想,少数骨干及特工分子,还进行笼络军官,控制士兵,散布谣言,抗拒改造的罪恶活动。地方系队伍中,有的人暗地散布“川人治川”等口

^① 西南军区《关于处理西南区起义部队的综合报告》。

号,军队内部实行家长式统治,裙带亲属关系复杂。吸毒、贩毒、嫖赌、敲榨民财等时有所见。游杂武装,各有政治背景,以川系军阀、当地大地主以及青年党等为后台。成分复杂,袍哥、土匪、散兵、特务分子互为结合。有的甚至冒充地下共产党员,虚报人数,谎报编制等。

对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了“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的方针,下功夫从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制度上进行改造,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针对部队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改造方法。对起义较早、作用较大的川康地方系部队,经过发动士兵,团结改造军官后,进行改编,其团以下军官尽力安插留用,团以上军官用的条件也宽一些;对技术兵种,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军官一般不动;对特务性的宪兵团、交警以及成分复杂的游杂部队,军官调训,士兵收枪,集中进行诉苦教育后编入解放军;对被打垮后才被迫起义的胡宗南主力,除留少数进步军官外,大部军官调训,部队改造后编入解放军;未彻底改造即需调外区的部队,除少数反动分子外,一般军官暂时不动。

根据上述方针、原则,首先是对起义部队进行改造整编。西南军区组成四个军事代表团,驻川、康各军区也分别派遣军事代表团,于1950年1月,

先后分赴起义部队,实施改造整编。军事代表团到达各部队后,一是宣传政策,安定情绪,联络感情,了解情况。二是整顿组织,采取合并单位,抽出全部政工、特务、党务人员,分批抽调军官离队受训,以便发动士兵群众。三是开展民主运动与诉苦运动。原一二七军一个团共1022人,除76名军官未参加诉苦外,士兵诉苦诉出被地主逼死人的80人,妻子被逼改嫁的43人,被保长霸占的22人,卖儿女的23人,被抓丁的404人,被骗当兵的316人,讨饭的195人,挨过军官骂的558人,挨过打的615人,被克扣过军饷的400人。通过诉苦,士兵阶级觉悟普遍提高,积极要求参加解放军。四是进行整编。将一部分军官分别安插,将18~25岁的青年士兵编入参军队,其他编入受训队(军官)、复员队。然后将参军队送到解放军驻地,并分别举行欢送、欢迎大会。其中编入川东军区部队及十二军的计5438人,编入川南军区部队5810人,编入川北军区部队5464人,编入川西军区部队34629人,编入西康军区部队24044人。对于游杂武装,主要采取官兵分治,集中教育审查。士兵经过诉苦之后,混编到专区、县人民政府基干队;中队以上军官中成分较纯有进步要求的,酌量安插副职或分配其他工作;其余军官集中训练处理。散布在广大乡村未脱离生产的武装,数量大,情况复

杂,对这部分人,不集中,也不急于收缴枪支,采取结合筹粮、剿匪、反霸、减租和土改等群众运动,实行“枪换肩”的办法,将武器逐渐转到基本群众手中,变为民兵武装。

其次是对军官的集训和处理。在对起义部队教育改造中,先后抽调大批军官和编余军官集中西南军政大学及各分校学习。仅川西分校就集中校、尉官 20500 余人,川东分校集中 3121 人。上校以上军官由军政大学设高级研究班收容集训。集训中,贯彻政治教育与劳动教育相结合的方针。通过劳动实践、政策教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以及两种社会、两种军队的对比教育,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对旧社会、旧军队的控诉。经过教育改造后,根据西南军区复员委员会关于处理起义军官的有关指示,对中下级军官中已消除敌对思想,家

住老区、半老区及匪患肃清、群众基本发动又非灾匪区,有家可归并能自谋生活又自愿回家者,予以复员,其中有技术及可做文化、军事教员的青年则留用,其余继续留训,以后再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安排处理。

对起义后又叛变的部队,则采取坚决、迅速、彻底消灭的方针。对俘回的官兵,采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予以教育改造,从轻处理。

起义部队改造整编后,原国民党军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等起草的反映该部整编情况的报告中说:士兵对这一政策完全满意;部分军官表现不舒服,但在党的正确政策与群众的压力下,又无可奈何。地方群众反映,解放军又打了个大胜仗,实在了不起!对数十万起义部队进行改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个创造。

四川、西康起义部队整编改造情况统计表

表 4—1

起义地区	部队番号	主官姓名	起义时人数	接收时人数	集训人数	补入解放军人数
川 西 军 区	九十五军	黄 隐	15000	16471		
	二十军	杨汉烈	16000	12849		
	一二四团及独二旅	白济民	397	397		
	三十六军一二三师 三六九团	蒋松璋	1188	1188		
	重庆师管区空军特务营	李铁青	573	573		
	新编十二军	彭 杰	20000	4797		
	宪兵司令部及宪兵 二、十四团	赵 璜 郭天恒	5000	1247		
	三兵团	朱鼎卿	4000	5095		
	战防炮营	文子模	306	306		
	十二师三四团		1059	1059		
	人民协作军	黄 鳌	1926	1926		
	川西北自卫军	刘北黎	2000	593		
	民主联军六纵队	王迪常	250	250		
	保十一团	张豫波		1551		
	治总七总队	田泽孚	267	267		
	挽马一、二团	潘志玉 向用勤	1819	1819		
	骑二旅	吕纪化	1134	1134		
	民主联军十三纵队	马福祥	281	281		
	平剧队军乐队		190	190		
	西南游击第一路	王缵绪	10000	50		
	新三军	曾子荣	61	61		
	川陕边区第七军	周树德	267	267		
	鄂西师管区		214	214		

起义地区	部队番号	主官姓名	起义时人数	接收时人数	集训人数	补入解放军人数
川 西 军 区	四川保安司令部及保五团	刘泽	10000	646		
	民主联军十纵队	马辰	200	200		
	新四军	杨勤安	365	365		
	军校干训班干训队二总队		2394	2394		
	陆校军训班一总队		1191	1191		
	指挥部一总队及三总队		1922	1922		
	三六军八〇师二三八团及收容		1532	1532		
	辎重兵兽力一、二团		1885	1885		
	预五师及三六五师	任德鉴	6676	6676		
	炮十一团及战车营		2041	2041		
	战防炮营及工兵连		2219	2219		
	骑二旅		527	527		
	五〇医院		1079	1079		
	三军二师	何梁	4000	398		
	川康人民自卫军十九纵队	王从周	798	798		
	治总一军教导旅		602	602		
	豫陕鄂绥署警卫旅	张广居	3000	2725		
	工兵师		4102	4102		
	通信团等四个单位	陈志力	1973	1973		
	小计			128438	85860	29373
十五兵团	罗广文		22000	14876		14000
十六兵团	董宋珩		60054	52081	3126	28400
二十兵团	陈克非		24000	18990		18490
七兵团	裴昌会		29000	22982	2700	12874
合计			263492	194789	35199	108393

起义地区	部队番号	主官姓名	起义时人数	接收时人数	集训人数	补入解放军人数
川东军区	十八兵团及二三五师	李振 潘清州	30532	22121	13672	4530
	四一九团		1132	1132		908
	合计		31664	23253	13672	5438
川南军区	七十二军	郭汝瑰	19000	15800	5000	3910
	一五〇师	周之再	1200	1900		1900
	七二二团					
	合计		20200	17700	5000	5810
川北军区	一二七军	赵子立	12330	12330	4042	5464
	范绍增部	范绍增	40000	40000		40000
	合计		52330	52330	4042	45464
西康军区	二十四军	刘元璋	14000	11078		
	川陕甘边区第二路	许绍宗	144	144		
	一二四军二二三师	英俊人	3807	3807		
	独二六三师	徐正纲	2000	900		
	独三六一师	罗君彤	4800	4800		
	治总九总队	金宿尘	80	80		
	四四军	周廷青	6720	6720		
	治总二、三纵队	王一立	2417	2417		
	保四团	陈鼎卿			257	
	宪兵十五、十六团及 宪兵学校	马俊麟			2219	
	治总五军	沙靖				
	陆军军官学校	沙吉夫				
	治总九军	曾庆集	336	336		
	合计	吴起舞	2849	2849		
	岳昌瀛	3256	3256			
		40409	38863	9083	24044	
总计			408095	326935	66996	189149

附注

1. 此表根据 1950 年 10 月 18 日西南军区政治部《西南区起义部队处理情形统计表》拟制。
2. 起义部队中十五兵团、十六兵团、二十兵团、七兵团及范绍增部调外区，补入川西军区实为 34629 人，补入川北军区为 5464 人。
3. 起义部队人员除抽调集训、补入解放军外，其余分别为资遣、逃亡等，也有少数叛变。
4. 表中川西军区接收人数小计应为 85860，但原表为 85851，制表时已作改动。

第五节 文化工作

一、文化教育

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红四方面军要求每个红军战士“要识字读报学政治”。鉴于部队中文盲大量存在,方面军在1933年6月召开的木门会议上,提出要积极扫除文盲,促进军政训练。部队采取干部战士混合编组,能者为师,分组教学,战时少学,平时多学,一天认三五个字,积少成多的办法开展文化学习。彭杨军政学校(后改为红军大学),也专门设有文化课程。

新中国成立后,驻川部队坚持开展文化教育,并多次掀起高潮。

50年代初,部队战士中文盲、半文盲占80%,干部中不到高小程度的约占68%。为适应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实施大规模的文化教育。1950年8月,西南军区党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从1951年1月起,开始正规的三年文化教育。

各部队积极选配和培养教员,建立各类训练机构,推广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教学法”(即使用注音符号识字的方法),并开展文化教育中的立功创模运动。至1953年,四川军区全区共有速成中学2所,速成小学1所,在职干部文化补习学校19

所,补习班11所,连队小学304所,教学班977个(茂县分区除外)。参加学习的人数占总人数95.6%。从1951年1月~1953年5月,通过学习,消除了部队中89.5%的文盲、半文盲,涌现出大批功臣、模范和先进单位。从1953年6月开始,部队文化教育由突击运动转为经常教育。

1958年底,全军政工会议提出用十年时间,在干部中普及中、高等教育。1959年5月,成都军区召开文教工作会议进行部署。会后,各部队从实际出发,采取机关、学校以部门为单位举办业余文化学校,营连举办文化补习学校,组织干部短期离职轮训,派人参加地方夜校等多种方式组织干部学习。并配备了专职教员202名,兼职教员1475名。同时还强调在职自修,并在团以上机关设辅导站、函授站,加强对自修的指导。当年全区共办文化补习学校、自修班和轮训队500多个,参加文化进修的干部占92.7%以上。1960年,军区要求“小学催马赶队,中学快马加鞭,大学跨马上路”,力争在三、四年内基本上完成普及中等教育的任务,并为两三年后全面开展高等教育准备条件。但后来由于林彪指责文化教育占用时间过多,

批评普及中、高等教育是把政治工作方向搞偏了。从1961年起,部队文化教育陷入停顿状态。

1978年12月,总参、总政、总后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把科学文化教育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教育训练。从1979年起,各部队将文化教育摆上了重要议程。仅四川省军区就办起教学班(组)859个,其中高中班(自学组)70个,初中班448个,小学班341个,共有学员25831人,兼职文化教员2080人。

1983年4月,总政治部在《关于加强全军干部科学文化政治理论教育的决定》中,要求凡40岁以下干部,1990年前,都要达到并力争提前达到高中毕业或中专毕业,其中一部分干部要达到大专程度。成都军区把组织干部向科学文化进军列入年度计划,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治机关重新规划干部的文化学习,加强师资力量,增加参训人数,采取多种途径,广开办学门路。当年全区部队有15400多名干部通过离职学习、结合本职专业学习等方法,学习初中、高中、中专、大学课程。还有3700多名干部参加电大、函授和业余自修大学学习。1984年,成都军区又专门就发展高中教育召开座谈会,研究制定相应措施。至1985年全区40岁以下,不具备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基本完成初中学习任务。在此基础上,各单位普遍发展了高中和

中专教育,一部分干部参加大专班学习。56005部队完成普及初中教育的任务后,1985~1986年底,基本完成高中教育课程;1987年底,大专毕业人数约占该部干部总数的1/4。

战士的科学文化教育,主要是开展军队、地方两用人才的培训。从1978年起,驻川部队贯彻邓小平关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指示,组织战士学习语文写作、农机电工、医疗卫生、果树栽培、财会、兽医、通讯、摄影等科学文化专业知识。并总结推广56038部队“分类办班、明确标准、定向培养、按级管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经验。

1982年11月,四川省和成都军区联合召开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理论讨论会。1984年9月,成立了四川省和成都军区军地共育两用人才指导委员会,由省委、省政协、成都军区领导担任主任委员,地方和军队有关部门负责人担任委员,并制定了共育指导委员会《工作细则》,对军地共育工作中的师资力量、考核发证、推荐录用等问题作出规定。之后,全川驻军所在的地、市、县,由军地有关领导机关联合建立了173个军地共育指导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有力地推动了共育工作的发展。仅1984年,全区部队有两用人才学校102所,育才基地395个,开办各类专业技术知识学习班1766个,有61500名战士参加学习,其中13612名战士获得地方有关部门颁发的各种

等级职称证书和中专单科结业证书。为做好两用人才退伍后的安置工作,根据四川省共育指导委员会的决定,四川多数县、市均成立了两用人才介绍所,有的区、乡、镇也成立了类似机构。仅南充地区就有800多个,1984~1985年春,先后推荐安置2753人,还扶持2671名有一技之长的退伍军人自谋职业。截止1985年初统计,当时四川农村的富裕户中,有30%是退伍军人。56016部队还采取部队党委与地方政府共同领导,以团为单位建立多功能的常设学校,培养军地两用人才。1987年5月3日,总参军训部、总政宣传部、总后司令部联合发文介绍该部学校式育才的经验,认为是部队“实现一体化教育训练规范化、制度化的一个有益尝试”。

二、文艺体育

红四方面军在川时期,各军设置有俱乐部、剧团、红场委员会,团有综合性的宣传队,连队有列宁室。当时部队的文化活动是以剧团、宣传队等专业文艺队伍为主体开展的。部队行军时,他们立于道旁宣传鼓励;宿营时,教指战员唱歌、识字;战斗发生时,深入前沿阵地慰问,对敌军喊话,与指战员并肩战斗;部队休整时,下连队巡回演出。方面军工农剧团,经常自编

自演话剧、活报剧、川戏、歌舞节目,还经常利用民歌、山歌曲调填写歌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曲调,原流行于西北军,后填入新词,成为一首纵贯人民军队历史的歌曲^①。他们结合部队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部队生活进行创作和演出,创作了《打骑兵歌》、《吃牛肉歌》、《射击歌》、《站岗放哨歌》、《出操歌》等,表现了部队战斗训练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级宣传部门普遍设立有贴(标语)发(传单)队、粉笔队和鑿花队。他们依据川陕省委和方面军制定的宣传大纲,散发传单、绘制漫画,还利用岩石、石碑、石坊、桥桩、磨盘等石料,刻制了大量的革命标语,借以教育部队和地方群众。每逢节日,都要组织群众性的文艺体育活动。193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方面军总政治部在炉霍举办了墙报、讲演、歌咏、体育比赛和食品、衣服展览。体育比赛的项目有:田径、球赛、跨越障碍、刺杀、投弹、识图、测距、利用地形地物、绘制地图、架桥、搭帐篷、烧牛粪等,许多项目是结合实战需要设置的。方面军领导亲自担任裁判员。骑兵师师长许世友在运动会上作了表演。

1950年12月,总政治部召开全军宣教文化工作会议,并作出关于开展连队文化娱乐活动和开展部队体育运动两个决定。1951年,西南军区

^① 刘瑞龙《红四方面军文艺工作略谈》。

作出《关于开展文化娱乐体育活动(课外活动)的指示》,要求首先把文化部门建立起来,并决定团以上成立课外活动管理委员会。四川军区成立后,1952年11月专门召开青年文化工作座谈会,总结交流经验。1953年1月,四川军区又成立体育指导委员会。当时,把俱乐部工作作为部队文化工作的重点。各部队先后建立健全俱乐部组织,团政治处俱乐部具体指导连队俱乐部开展活动。在当时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一般的连队做到每周或两周都有一次文娱晚会,出一次黑板报或墙报。不少连队在分散的情况下也坚持文娱活动,成都军区独立九团九连分驻7处,俱乐部组织幻灯及文艺节目到各班演出。独立六团九连驻守在深山老林,交通不便,纸张缺乏,就用桦树皮出墙报。各级文化部门注意发动和组织群众性的创作活动,战士们用画来记日记,用字来组画,用体育与舞蹈结合创作反对美帝的《叠罗汉》,创作京剧《美帝侵华史》以及创作各种舞蹈、歌剧、话剧、快板剧、金钱板、莲花落、采莲船、顺口溜等等。1953年12月至翌年1月,西南军区举行文艺检阅大会,汇报演出持续11天。

1961年10月,全军政工会后,总政治部发出《对当前部队文化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军贯彻执行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并对部队群众性文娱活

动提出“处处有歌声,月月有晚会,经常做游戏,假日有活动”(以下简称“四句话”)的要求。为落实总政治部指示,各部队帮助连队普遍建立演唱组,作为开展文娱活动的骨干力量。到1963年,全区有80%以上的连队都建立了演唱组,落实“四句话”好的和比较好的连队占87%。为了促进文艺创作,1962年成都军区建立两个专业创作组,并在开展群众性创作活动中,培养100多名业余作者。仅1962年就创作各类作品974件。



驻川某红军团开展课余文化生活

1978年,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要求做好部队文化工作,活跃连队文化生活,并把1961年提的“四句话”改为“处处有歌声,人人搞体育,节日有晚会,假日有活动”。56030部队,创办了综合性、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中心”,设有荣誉室、图书室、阅览室、电视室、广播室、

音乐室、美术室、游艺室、乒乓室、游泳池、排球场、羽毛球场等 14 个活动场所,建立了创作组、文艺组、美术组、评论组、游艺组、故事组、体育组、放映组等 8 个活动小组,还组建了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和水球等业余球队以及干部合唱队、象棋队等,推动了连队基层文化活动的开展。1980 年 10 月,总政治部在该部召开了全军文化活动中心现场会。1981 年各部队先后开展创造文化活动先进连队和先进电影队(组)活动。业余文艺创作也取得新成果。1982 年,成都军区召开业余创作授奖大会,有 132 件作品获奖。1987 年,成都军区依据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

议,制定基层文化工作三年规划,并对团和连队军人俱乐部提出具体标准,使部队文化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各级专业文艺、体育工作队伍,坚持面向基层,面向边防,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文工团经常深入部队巡回演出,为连队培养文娱骨干,辅导群众性的文艺创作,组织部队联欢,传播部队开展群众性文娱活动的经验。文工团员还经常深入班、排、伙房、帐篷、哨卡、病房为战士教歌、写信、缝衣服等。体育工作队贯彻培养优秀选手与普及部队体育运动相结合的方针,经常下部队表演和辅导基层体育活动。成都军区男子排球队曾三次获全军冠军。

第六节 立功创模和创造先进连队

立功创模活动,是人民解放军开展的为祖国为人民创建功勋,争取荣誉的群众性活动,是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创造先进连队活动,是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推动基层全面建设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对立功创模活动的继承和发展。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时期,结合战役、战斗开展杀敌立功活动,对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激励斗志,胜利完成作战任务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驻川部队继承解

放军的优良传统,开展立功创模和创造先进连队,成为部队一项经常性活动,持续不衰。

一、立功创模

50 年代初,西南军区召开第一届英模代表会议,有 137 位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出席。刘伯承司令员致开幕词,邓小平政委作《发扬积极因素战胜消极因素》的讲话。会后,西南军区党委又发出《关于开展全军区新英雄主义运动的号召》,要求部队各级定期召开

英雄代表会议,大体上师、军分区半年一次,军、省军区一年一次。部队开展学习文化和正规军事训练后,西南军区又先后发出在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中开展立功运动的指示。驻川、康各军区迅速贯彻执行,在部队中掀起了新的立功创模热潮。这个阶段的立功创模活动是紧密结合部队所担负的文化学习、军事训练、剿匪、筑路等各项中心任务开展的。中心任务的要求,即是立功创模的条件。1953年上半年,西康军区有1013人立功,其中立一等功11人,立二等功178人,立三等功824人。1954年2月23日,《四川军区四年来立功创模运动》的总结称:部队入川以来,在完成进军作战、剿匪、征粮、改造起义部队、发动群众筑路修建、文化学习、军事训练等各项工作中,立功创模运动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仅在文化进军中,就涌现出两个文化学习一等模范连队,两个卫生一等模范连队,三等以上功臣4880名。同年2月,四川军区党委又作出了授予在学习、工作、筑路、执勤、剿匪、拥政爱民等方面表现突出的11名干部战士以二级英雄、模范称号和某部班长李书堂烈士一级爱民模范的决定。并组织全川部队宣传学习英模事迹,推动立功创模活动在驻川部队中更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

二、五好运动

1956年,随着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发展,为解决技术落后于装备的矛盾,成都军区决定在驻川部队中开展“创造优等射手、技术能手和先进工作者”活动,并于同年8月召开“成都军区第一次先进分子代表会议”,出席会议代表1124人。有81位代表作了典型发言,会议为3个先进集体和荣获一等、二等先进分子称号的214人授奖。这项活动持续约两年。

1958年,驻川部队响应总政治部号召,在全区开展“五好运动”(努力学习好、爱护武器装备和一切公物好、消灭事故好、生产节约好、锻炼身体好)。当年9月,从成都军区至部队的团,层层召开了先进分子代表会议。1960年3月,成都军区政治部根据运动的发展统一颁发了五好连队条件:1、政治挂帅,思想领先;2、成绩突出,全面跃进;3、亲密团结,保证安全;4、积极生产,厉行节约;5、情绪活跃,增强体质。在全国大跃进形势影响下,“五好运动”强调政治挂帅和发扬共产主义风格,通过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把运动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一个狠抓基层以五好为目标建设连队的群众运动,在全区范围展开,“推动了以平叛、训练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全面

跃进。”^① 全区涌现五好单位 700 余个,3 万余人受到奖励。

三、四好运动

从 1961 年起,驻川部队又根据 1960 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和总政治部的指示,开展创造四好连队、四好单位和五好战士的群众性运动。四好连队指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四好单位指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指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完成任务好、三八作风好、锻炼身体好。1961 年 1 月,成都军区政治部在“关于创造四好连队的几点意见”中提出 5 条要求:1. 加强宣传工作,造成强大的声势;2. 学好毛主席著作,以毛主席思想指导创造四好连队;3. 改进领导机关作风,面向基层,以创造四好连队的成绩,作为检查机关工作的标尺;4. 党支部必须把创四好连队作为中心任务;5. 抓典型,立标兵,建立定期评比奖励制度。此后四好运动代替五好运动,在驻川部队中持续开展起来。1963 年 2、4 月,成都军区政治部又先后发出结合四好运动开展学习雷锋和“好八连”的活动,一个人人争当雷锋式的五好战士,连队以艰苦为荣,革命利益第一的热潮又在部队掀起。

开展四好运动的具体作法是,年初动员,从个人到单位层层制订计划,每季度进行一次形势分析,半年初评,年终总结评比。1961~1965 年,成都军区部队共涌现出 257 个四好连队。四好连队历年占全区连队总数的比例依次是 30.59%、32.57%、35.36%、32.4%、35.85%。其中连续 4 年评为四好连队的占 38.5%,连续 3 年的占 12.6%,连续 2 年的占 25.7%。全区累计评出五好战士 79111 名,评出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 31544 名。至 1971 年,成都军区先后召开过四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三届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在 1970 年 3 月召开的第四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暨第三届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上,驻川部队有 7 个连队和单位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四好连队、四好单位标兵;有 9 人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五好战士标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突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官兵头脑,指导军队建设;活动主要在基层展开,体现了军队建设的重心在连队;1964 年前,军事训练在基层掀起高潮,部队的作风建设和军事技术水平有显著提高;比学赶超的群众竞赛,激发了官兵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① 《建军报》1960 年 4 月 9 日“一面红旗红一片,百面红旗红满天”。

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驻川部队涌现出的大批四好连队,大多数是好的,过得硬的,绝大多数五好战士政治思想好,作风硬,技术精,完成任务出色,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各级优秀指挥员。运动后期,因受林彪“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错误口号影响,出现了政治思想好代替其他三好的错误倾向,对基层建设产生了不良影响。

四、“双学”活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恢复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从1977年起,驻川部队遵照军委的指示,再次开展了学习雷锋和“硬骨头六连”的活动(以下简称“双学”活动)。成都军区党委作出了决定,各部队召开了动员大会,强调以雷锋和“硬骨头六连”为榜样,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道德和严格的纪律;建设在政治、思想、军事、纪律、作风各方面全面过硬的连队。各部队通过宣传教育,深入进行思想发动,清除林彪、江青等人破坏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的影响,划清是与非,美与丑的界线,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组织学习《军人誓词》、《部队青年道德修养守则》,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部队又掀起了争当雷锋式革命军人,争创“硬六连”式先进连队的热潮,一个先人后己,助人为乐,勤俭节约,讲文明、守纪律的风尚又开始兴起。

当年,各大单位评出学“硬六连”的先进连队和相当于连的先进单位335个,学雷锋积极分子7215名,有741个单位和6609名个人立功受奖。1978年10月,成都军区召开了先进代表大会,经成都军区党委批准,有22个连队、单位被命名为“硬六连”式连队、单位;有22人被授予雷锋式干部、战士、工人称号。

五、“双先”活动

1982年3月1日,为贯彻全军政工会议精神,使“双学”活动更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成都军区党委决定在军区部队中开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连队和先进个人的群众性活动(以下简称“双先”活动)。军区政治部制订了开展“双先”活动的试行办法。明确指出“双先”活动旨在培养“四有、三讲、两不怕”的革命军人和先进连队,其中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是“双先”活动的核心;要求领导带头,党员以身作则,机关齐抓共管,定期分析形势,在深入、持久和讲求实效上下功夫;师以上机关重点抓好一个团,培养典型,指导面上活动;要紧密结合各项任务开展,各项评比活动都要纳入“双先”活动中来。先进单位评比只在连队和相当于连队的基层单位进行,机关不搞评比。先进个人评比在战士和团以下干部中进行。具体办法是:每年结合年终总结评定一次。

先进连队由团级单位组织评比,师级党委批准;先进个人,战士由连推荐、营评议、团批准,干部按任免权限审批。“双先”活动开展以后,领导和机关形成了下连队抓基层的风气,部队出现了有理想、讲文明、守纪律、比贡献的热潮,“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老山精神在部队中普遍发扬。1982年8月,成都军区召开“双先”活动座谈会,总结交流经验。1983年3月,成都军区召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先进代表562名,并特邀14名老英雄、老模范参加。至1983年底全区共评出精神文明先进单位3693个,其中先进连

队315个,先进班、排3378个;评出先进个人19663名。1984年以后,驻川部队根据全军统一部署,结合各部队担负的任务,开展多种形式的争先创模活动,按《纪律条令》实施奖励,不再统一称号,统一评比。

驻川部队开展的立功创模和创造先进活动,推动了基层建设,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出色地完成了作战、训练、施工、抢险救灾、学习文化等各项任务,并涌现出大批战斗英雄、先进个人和单位。至1990年,先后荣获国务院、中央军委、国防部、志愿军总部、大军区和四川省政府、省军区授予称号的有570人,立一等功的753人。

第七节 尊干爱兵

尊干爱兵是人民解放军内部民主、官兵一致的体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驻四川的红四方面军和长征经过四川的中央红军、红二、六军团,在战争十分频繁,环境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政治机关非常重视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官兵关系,从中央主席到士兵,人人都用自己的行动体现了官兵一致、团结友爱的人民军队的本质。新中国成立后,驻川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和发扬尊干爱兵的传统。

一、检查、整顿官兵关系

50年代初,部队补充了大量起义、解放战士,招收了一批知识分子,为抗美援朝需要,进行了较大规模地扩军;部队大批骨干被抽调支援地方政权建设,有的部队新成分达到90%。加之进城以后,不少干部产生了居功骄傲情绪,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军阀主义作风有所滋长,官兵一致的原则受到严重影响。1950年5月12日,西南军区党委发出“干部整风指示”。整风中,把检查官僚主义、军阀主义,解决好官兵关系作为重要内

容。涪陵分区连以上干部有407人参加整风,自觉检查打骂过战士和群众的就有106人,璧山分区排连干部打骂战士的有17人。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清算了军阀主义的不良倾向。在干部整风之后,又在战士中整顿纪律。1951年8月21日,西南军区《人民战士》报发表“加强人民军队本质教育”的社论,各部队先后开展尊干爱兵教育,提高对人民军队本质的认识。教育后期,干部战士分别制订尊干爱兵计划、公约,改善了官兵关系。

1955年部队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薪金制以后,等级观念在部分干部中有所滋长,加上军队进入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后,有的干部不能正确处理集中与民主、严格管理与耐心说服、武器装备与人的作用等关系,爱兵观念淡漠,惩办主义抬头。1956年12月,成都军区根据总政治部指示,决定在驻川部队中开展民主检查,整顿官兵关系。各部队在动员教育成熟的基础上,采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方法,酝酿讨论,找出本连官兵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别由连长、政治指导员作好准备,经支委会研究,在军人大会上作检查,通过民主检查,官兵都受到很大教育。民主检查后,又进行尊干爱兵教育。在此基础上,针对实行军衔制、薪金制后,干部就餐在军官食堂,住宿在军官宿舍,参加训练、劳动少的情况,开始实行基层干部与战士

“五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同时又恢复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如营连军官夜间查铺查哨制度;团每年一次,营半年一次召开军人代表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连队军人大会和排务会、班务会制度等,保证士兵有提意见的充分机会;各营(连)建立健全伙食管理委员会或经委会,定期公布帐目;注意劳逸结合,让士兵假日有活动时间,并组织有益的集体活动。清理对士兵的处分,凡处分错的一律撤销,处分过重的坚决改正。这些具体措施,使官兵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

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成都军区党委于5月13~15日,召开党委书记联席会议。党委书记贺炳炎、副书记郭林祥就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开展整风运动作了报告,决定军区自上而下分批分期开始整风,着重解决官兵、上下、军民、前后方的矛盾。整风以后,又实行领导干部每年深入部队三、四、五(军职三个月,师职四个月,团职五个月)和干部下放锻炼、下连当兵的规定。1958年4月,成都军区先后抽调机关、学校中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145名下连队当兵锻炼,其中约有94%到康定、凉山、茂县艰苦地区担负平叛任务的连队。1958年9月,成都

军区按总政治部关于实行军官下连当兵制度的要求,军区司令员、政委率首批机关干部下连当兵,到1958年底,全区下连当兵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5%,其中将官占66.6%,校官占24%,尉官23%。至1959年2月,全区应当兵的干部基本轮完一遍。各级领导和机关干部走出办公室,深入连队,研究与解决各种问题,并以普通士兵姿态生活在连队,以模范行动影响战士,保持和发扬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尊干爱兵的光荣传统。

二、尊干爱兵运动

1961年初,成都军区对驻川部队的管理教育、官兵关系进行调查后指出:干部的模范作用普遍加强,能坚持与士兵“五同”,关心士兵的进步、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尊干爱兵传统进一步发扬。同时针对少数干部工作方法生硬,处理问题简单,生活作风特殊,对士兵关心不够等问题,提出10条措施。1961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针对部队官兵关系出现的新情况,对干部战士分别提出八条要求。成都军区从6月中旬到8月中旬,开展以学习贯彻“连队管理教育条例”为中心的尊干爱兵运动。运动以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为指针,以“条例”为武器,以干部为重点,以发扬积

极因素为主,采取忆传统,搞对比,解剖实例,宣扬标兵等办法,深入进行阶级教育和传统教育。并检查清理1957年以来处理战士的情况,有效地解决了连队管理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据运动后期统计:管理教育好的连队,由运动前的30%左右上升到50%,差的由25%左右下降到10%。运动结束后,成都军区于同年9月又发出《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的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支部,把贯彻执行条例列为经常工作,连队要定期检查尊干爱兵公约的执行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干部要熟记爱兵八条要求,增强爱兵观念,巩固发展尊干爱兵运动的成果。1961年12月,成都军区推广了步兵一团四连经过尊干爱兵运动后,消除了官兵之间的隔阂,干部以身作则,关心战士,把解决战士的实际问题与思想问题结合起来,并定期检查评比,官兵关系融洽,部队情绪高昂的经验。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对军队的集中统一和正规的工作、生活秩序带来一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驻川部队仍十分重视尊干爱兵传统的保持和发扬,坚持下连当兵、代职。1972年上半年,四川省军区有6305名营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代职、蹲点。其中,军职9人,师职80人,团职815

人,营职 571 人,机关连排干部 4830 名。0015 部队 17 名领导,在野营训练中,分头下到连队对连队干部进行传、帮、带。从出发前的动员,行军中的思想、体力互助,宿营后的看望、关心战士,检查战士烫脚、挑泡到查铺查哨,均口传身教。培养了基层干部,增进了官兵感情,保持了部队的稳定。

在发扬尊干爱兵传统中,驻川部队针对少数民族战士多的特点,重视加强各民族官兵的团结。1954 年 1 月,西南军区在转发某师“团结教育兄弟民族战士工作的经验”时指出:对兄弟民族战士,要坚持团结教育、逐渐提高的原则,在政治上帮助他们进步;在生活习惯上尽可能照顾其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和特点;并在自愿的基础上,逐步改变其不适应部队正规化建设的生活习惯。严禁讽刺嘲笑、简单取消的急躁冒进情绪,坚决反对所谓“同化政策”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在 1957 年的连队社会主义教育中,各民族部队联系实际,着重解决部队中一度存在的对党的民族政策理解不够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问题,使部队官兵关系、军民关系进一步增强。1971 年和 1973 年,四川省军区先后对二个团培养少数民族战士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将他们的经验在全区推广。据独立五团不完全统计,该团彝族战士中共涌现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32 名,立功的 56 名,提为干部的 58 名,还为地

方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五好战士,其中 280 人成为区、乡、社干部。8673 部队三机连的战士来自 17 个民族,全连官兵亲密无间,1972 年 6 月 8 日,成都军区《战旗报》以“激发阶级感情,增强革命团结”为题,宣传了他们的经验。

三、新型的官兵关系

粉碎“四人帮”后,驻川部队根据军委指示深入进行了“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应该不应该严格管理和严格要求”等十个应该不应该的讨论。结合学习官兵团结的论述,回忆人民军队尊干爱兵的历史,检查官兵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从思想认识、理论原则、规章制度等方面,系统地清理“左”的影响,废弃不合理的规定、制度,使尊干爱兵的光荣传统又放出新的光彩。56083 部队三连曾经是尊干爱兵的先进连队,“文化大革命”中,官兵关系受到影响。在教育中,批判了“四人帮”散布的革命传统“过时论”和“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等谬论,分清了是非,连队又跨入尊干爱兵的先进行列。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消极影响给部队密切官兵关系带来了不利因素;加上 80 年代以后入伍战士的文化程度、思维方式、入伍动机、爱好需求各异的特点,

也给部队的管理教育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不少基层干部感到“兵难带”。1982年7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根据客观条件变化对官兵关系提出了新

要求。1986年7月,总政治部又提出全军官兵必须严格遵守的“八个不准”,^① 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



全国战斗英雄某师副师长卫小堂在野营拉练中帮助战士扛枪

驻川部队认真贯彻上述指示、规定。在部队中加强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组织干部、战士深入学习,澄清模糊认识。联系实际,对照检查,找出主要问题,订出改进措施。使尊干爱兵的新要求和“八个不准”深入人心,成为干部、战士的自觉行动。曾经有过缺点和错误的干部,不讳疾忌医,认真进行自我批评。体罚过战士的,主动向战士赔礼道歉;接受过战士礼物、侵占过战士利益的,自觉退还和退赔。一些部队中的“老乡观念”“哥

们义气”渐渐失去了市场,“送礼风”、“吃喝风”和拉关系“走后门”等不良风气基本得到了制止。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新人新事大量涌现。1986年4月,56005部队为在公共汽车爆炸燃烧的关键时刻,奋不顾身救出7名群众,妻子和内弟被火烧死,自己被烧成重伤的某部司药庞远贵记一等功,并在部队中开展向庞远贵学习的活动。

各部队针对80年代入伍战士的新特点,开展调查研究,更新爱兵观念,拓宽爱兵内容,制定新的爱兵、管

^① 不准打骂体罚战士;不准接受士兵的礼物;不准侵占士兵的利益;不准对士兵罚款;不准喝酒;不准赌博;不准看淫秽物品;不准弄虚作假。

兵、用兵、练兵措施。许多基层干部能做到正确认识、理解战士,自觉尊重、关心战士,主动体贴、帮助战士。涌现出一批爱兵典型单位和个人。1984年2月和1985年6月,成都军区先后

授予56006部队某团五连政治指导员冯先国“爱兵育人模范指导员”称号,56005部队某团二连连长陶润林“科学带兵模范连长”称号。

第八节 拥政爱民

拥政爱民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军队本质的体现。红军在川时期,广泛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建国后,驻川部队发扬光荣传统,设立群众工作机构,建立群众工作制度,制定群众工作职责和规则,使拥政爱民工作开展得更经常、更深入、更有成效。

一、发动群众建立政权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通江县城,在通江成立川陕临时革命委员会,翌年2月正式成立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为了建立新的根据地,部队选调数千名干部战士组成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分片包干,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协助建立地方党和政权组织。至1935年1月,已建立通江、赤江、赤北(剑阁境内)、红江、巴中、南江、长赤、江口、广元、仪陇、苍溪、万源、嘉陵、恩阳、阆南、长胜、营山、渠县、宣汉、红胜、英安、达县、城口、红坪等县苏维埃政府和巴中市苏

维埃政府。

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在四川期间,除建立四川省苏维埃外,先后还建立了赤北(广元境内)、普安、赤北(剑阁境内)、金仙、平武、平南、江油、彰明、中坝、济时、梓潼、百顷坝、北川、冕宁、越嶲、茂县、汶川、理番、懋功、绥靖、崇化、金阳、天全、芦山、太平、宝兴、雅安、荣经等县级革命政权。

1935年9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又先后在川西北和康北地区组建了格勒得沙(又简称番人革命政府)、波巴依得瓦(又称波巴政府)两个共和国,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统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曾一度改称川康革命委员会。

四川解放初期,部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完成作战任务的同时,抽调大批干部和老战士,参加接管城市、征收公粮、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和帮助建立基层政权。这些干部和老战士大多数都转业地方,成为各级地方政权的骨干。川北军区1950年

抽调 2500 多名干部战士参加地方征粮,后又抽调 668 名干部转业地方参加组建基层政权;川南军区从 1950~1952 年 8 月,共抽调干部 1118 名,参加组建川南地区各级人民政府。他们为地方政权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1956~1958 年,驻川部队抽调 5000 余名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和工作组,参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工作。

二、支援国家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驻川部队始终把支援国家建设作为自己的一项重大任务。

(一)抢修都江堰

1949 年 12 月底,贺龙率部队进入成都,随即命令一个师和一个团开赴灌县,投入都江堰岁修工程,使成都平原农田及时得到春耕用水。之后,多次抽调部队参加都江堰的岁修改造和扩建工程。



驻川部队参加灌县都江堰岁修

(二)支援农业生产

部队采取定点挂钩经常支援、“双抢”“三秋”及时支援、农业受灾紧急支援、农田基本建设重点支援等方式,大力支援农业生产。据统计,1950 年川西军区在完成作战任务的同时,帮助群众挖地、浇田、插秧、种地近 2 万亩,除草、收割 18 万亩。1957 年,部队支援农业合作社 478313 人次。1956~1957 年两年内捐献建立拖拉机站款 87 万多元。1957~1958 年,移交给地方使用的土地 243.53 万余亩,房屋 33.64 万余平方米。在“大跃进”和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部队尽最大努力,抽出人力物力,支援地方农业生产。据 1958 年和 1959 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区部队支援地方达 341 万个劳动日,共帮助兴修水利 63 万多土石方,抗旱保苗 21 万多亩,耕种收割 36 万多亩,积肥运肥 400 余万担。1960~1962 年,驻川部队支援农业的义务劳动日超过 500 万个,退还人民公社土地 5400 余亩。成都军区出动汽车支援地方运粮和农业建设共 1600 万公里。1968~1984 年,56005 部队先后有 286 个连队与驻地 351 个农业生产单位挂钩定点支援,使 1900 多户贫困户生产、生活得到改善,810 户摘掉贫困帽子。甘孜、阿坝、凉山军分区所属部队,1977~1982 年,共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工农业生产和公益事业的劳动日达 29 万多个,帮助收割、

耕种、改田、治土 9990 多亩。驻川部队每年都要和人民群众一起植树造林。1958~1963 年,全区部队共植树近 500 万株。据 1983 年不完全统计,全区共植树 150 万株,成片造林 800 多亩。驻川空军 1983~1990 年,出动飞机 776 架次,共飞播造林 288 万余亩,同时还协助地方进行航空护林、人工降雨、抢救大熊猫等工作。1983 年 12 月~1984 年 1 月,空军还派出飞机,从成都至拉萨,连续飞行 20 架次,空运 10 万公斤饲料进藏,支援藏区牧民。

(三)修筑成渝、成昆、襄渝铁路

1950 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修建成渝铁路。西南军区直属队和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军区分别组建五个军工总队。川西军区计划投入军工 6000 人,实际参加 9700 余人。负责西起简阳县马草弯,东至资中银山镇 120 余公里的路基工程。上级要求 4 个月内完成,经指战员昼夜突击,提前 56 天,超额完成标准工 2.78 万个。后又调入 5 个工兵团、工兵学校、警卫连等部队参加施工。

成昆铁路四川境内由铁道兵五师、十师施工。成都军区除有四个野战医院配属铁道兵执行任务外,还抽调 0074 部队参加修建。

襄渝铁路西段四川境内由铁道兵六、七、八师和四川 25 万民兵负责修筑,1972 年 10 月 19 日建成通车。



解放军指战员参加修筑成渝铁路

(四)修筑康藏、成阿公路

康藏公路(1955 年后改称川藏公路),全长 2255 公里,施工条件极为艰苦。1950 年 4 月,西南军区抽调 6 个工兵团、3 个步兵团及其他部队共 1.8 万人参加筑路施工。在西南公路局 2 个工程队配合下,首先打通二郎山。1951 年十八军所属各师及第二施工局 1.1 万余名技工相继投入施工。于 1952 年 10 月修到昌都,1954 年 12 月 25 日全线通车。据统计,仅十八军参加施工的两个师中,就有 657 人身负重伤,178 人壮烈牺牲。

1950 年 3 月,驻川部队 3 个团和民工共约 2 万人,参加成阿公路(成都至阿坝)修筑,至 1955 年 11 月全线通车。

1950 年,西康军区抽调军政干校 1500 多人整修长 44 公里的雅(安)荣(经)公路,为国家节约数十亿元(旧人民币),为取得剿匪的胜利和恢复经济建设提供了方便。



毛泽东主席为川藏公路通车题词

(五) 援建重庆长江大桥、泸州长江大桥

1978~1980年，56224部队支援修建重庆长江大桥，投入1.2万余人日的技术力量，其所担负的测量任务，达到误差万分之一的精度，超过设计规定的一倍。56035部队于1980年1月隆冬季节，主动请战，出动1620人次，支援泸州长江大桥建设。

(六) 支援工矿企业建设

1956~1960年间，驻重庆各部队和军事院校共投入1.3万多个劳动日，支援重庆钢铁厂的恢复和扩建工程。在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部队抽调出机械设备400多部、废铁800多吨、炸药9.5万多公斤、各种工具4.5万多件和汽车360辆，支援钢铁战线。1960年，成都军区支援地方工矿企业达200多万个劳动日，帮助兴建和扩建厂矿41个。56005部队，1968~1984年8月，与驻地数百个厂矿、企业挂钩，共支援工业交通建设劳

动日351万个，出动机械，车辆61500多台次。空军部队为支援四川地质勘探工作，于1969年5~7月，先后出动飞机52架次，向川西北高原九龙矿区空投钻机、钻杆、车床、柴油、管材等地质勘探设备501件、1910包。驻川部队先后多次抽调建制部队参加重庆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等大型基本建设工程的建设。

(七) 参加市政建设

56168部队于1982年1月，参加成都市蜀都大道工程，在一年半内，共构筑地下电缆隧道1418纵长米，铺设管道3129米，修筑道路工程4.2万余平方米，挖填土石方21.13万余立方米，完成工程投资400万元。驻川空军于1985年底派出官兵支援成都市百花潭公园扩建工程，投入劳动日1.3万多个、机械车辆930台(班)、经费17万元，先后建成大假山、人工湖池、拱洞、瀑布等景点，经市政府验收，被评为优良工程。1987年初，又派出人员，参加成都市一环路南三、四段扩建工程，完成1.7公里的混凝土路面、4560米下水管道、470座检查水井，均为全优工程。56005部队派出工兵分队参加重庆市“八一”隧道工程建设，修建隧道568.63米(隧道宽11米、高6.83米)，完成隧道内部和口部各项装饰任务。部队施工中创造的“管棚法”，曾于1986年8月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国际大型岩洞专题讲座会上

进行交流。此外,还有 56006 部队和成都军区司令部、后勤部联合承建的成都市植物园,56016 部队承建的峨眉山旅游道路,56015 部队承建的南

充市体育场等等。部队在修建工程中不仅工效高质量好,而且纪律严,作风好,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一致好评。



重庆驻军支援地方建设的八一隧道竣工

(八)帮助地方发展科技事业

1958~1963年,驻川部队共派出各种技术人员1万余人对地方进行对口支援,为地方培训技术人员2万余人。1984年4月,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卫星通信试验获得成功后,其设施向民用开放。从1988年2月~1990年2月,先后成功地发射4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通信卫星的历史,也为国家通信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驻川空军,从1977年起,多次派出飞机,回收降落在四川的返回式卫星,圆满完成任务。89950部队坚持开展科技助民活动,1985年以来,对驻区45个建设项目转让技术成果、提供技术服务、开展技术咨询和承包工程项目。成都军区第一测绘大队,先后为地方培训测绘技术人员

300余人,编绘、施测城市建设、农业区域规划等用图200余幅。1982年,为青川县全境进行农田、水利、森林等自然资源大面积普查,绘制了约3万平方公里的农业规划图。第二测绘大队先后派出225人次,为成都、金堂、广汉等80个单位测绘公路、水渠、桥梁和国家重点工程,面积达2万余平方公里,印刷各种图纸50万张,培训测绘技术人员60人。

(九)支援医疗卫生事业

1958~1963年,部队为群众治病达40万人次,平均每年约7万人次。1960年2月23日,南充火花公社9大队190余人因氰化物食物中毒,危在旦夕。该地驻军医院接通知后,立即组织19名医务人员赶赴现场抢救,使中毒人员全部脱险。1966年冬,发

现流行性脑膜炎,驻川部队在数月内,相继组织 173 个防治队(组),赶赴疫区和生产第一线,为群众治病 13.37 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 340 余人。康定有个麻风病流行区,当地驻军医院医务人员,深入病区,控制了麻风病的流行。1971 年 1 月 31 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中西医结合会议上称赞该医院“搞麻风病这件事了不起”。阿坝军分区卫生科长陈心旺,战斗在高原 28 个春秋,先后为藏、羌民族群众治病 14 万余人次,抢救危重病人 500 多人。部队医院和派出的医疗队,除给群众治病外,还为地方培训基层医务人员。成都军区总医院 1970 年派出一支 70 多人的医疗队,在革命老区巴中县举办医务人员训练班 100 多期,为基层培训医生、卫生员、助产员、保健员等 700 多人。在紧急情况下,驻川空军还多次派出飞机进行抢救。1966 年 5 月,隆昌 32111 钻井队因事故爆炸起火,空军派出直升机 2 架,运输机 1 架,前往抢救,先后运送伤员 5 名。1986 年 9 月 2 日凌晨,驻川空军应四川省政府请求,派出飞机将国家卫生部从北京送来的急救药品运往营山县医院,使砒霜中毒的 164 名群众,及时得到治疗,全部脱险。同年 12 月 5 日上午,威远县钢厂锅炉爆炸,多人受伤。空军派出飞机首次在夜间野外降落,将其中 5 名烧伤严重的工人安全送到重庆抢救,使 5 人全

部脱险。

三、抢险救灾

(一)抗洪救灾

四川历年均有局部性的水灾。1956 年嘉陵江流域,1959 年沱江与岷江流域,1960 年大渡河流域,1961 年涪江、沱江与岷江流域,1968 年长江干流寸滩地区,1981 年嘉陵江、涪江、沱江、岷江和长江流域先后发生特大洪灾。每次洪灾发生后,当地驻军都立即出动,全力以赴,舍生忘死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1956 年嘉陵江流域发生 45 年以来的特大洪灾,南充市 3/5 的市区和农田被淹。驻该市的步兵预备第五师官兵,冒着倾盆大雨,在齐腰深的水里抢救出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大量财产,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赞扬。1961 年,岷江、青衣江、涪江洪水爆发,沿江两岸 12 万亩农田被淹。驻绵阳、温江、乐山地区部队全力以赴参加抗洪抢险,救出群众 1769 人,物资 2000 余吨。1964 年绵竹、什邡、广汉、金堂、温江等县连降暴雨,洪水成灾。成都军区部队出动 1000 余人,飞机 4 架,参加抗洪救灾,并支援灾区人民恢复生产。1981 年的特大洪灾有 135 个县受灾,受灾人口 2000 余万。驻川部队出动 480 个连队、21 万余人次,飞机 44 架次,7100 多台汽车,190 多只舟船参加救灾。成都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副司令员王诚汉及

团以上领导干部 900 多人到抗洪第一线指挥,连续奋战 90 天,从洪水中救出群众 4.3 万余人,接待灾民 6 万余人,抢出粮食、布匹等物资 10 万余吨,木材 2.4 万余立方米,大牲畜 4300 余头。派出 107 个医疗队和 1300 多名医务人员,为群众治病 7.6 万余人次。军区赠送灾区人民 50 万公斤粮食、5 万余套军装、5000 卷油毛毡。各部队又捐赠粮食 12.5 万公斤,被装 6.9 万件,人民币 6 万多元。洪水退后,部队又帮助清理街道 8 万多米,铲除淤泥 23.5 万吨,抢修公路 80 多公里,加固堤坝 6000 多米,修简易住房 8 万多平方米,帮助 638 个企事业单位恢复生产和营业。灾区群众生活得到妥善安置,生产迅速恢复,没有疫病流行,没有人逃荒外流。灾区群众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洪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1988 年 7 月,四川一些地区连降大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造成了人畜伤亡,房屋倒塌,交通受阻,通讯中断。成都空军机关和部队,出动人员 1000 人次,车辆 85 台次,飞机 10 架次,参加地方抗洪救灾,同时向灾区人民捐献人民币 9 万余元,煤油 6500 公斤,粮食 1.5 万余公斤,衣服 9 千余件,水泥 4 吨以及价值 5000 多元的药品。此外,驻川空军还于 1975 年 8 月,抽调 30 多人,派出运输机 1 架、直升机 5 架,紧急转场到郑州,参加河南抗洪救灾。共飞行 104

架次,空运、空投物资 50 多吨。



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到成都军区慰问抗洪救灾的子弟兵并赠送锦旗。图中左起依次为军区政委钟汉华、司令员尤太忠、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心源

(二) 灭火救灾

1977 年 6 月 10 日,峨眉县民房失火。56089 部队出动 7 个连队参加灭火战斗。1980 年 4 月 3 日,四川卷烟厂发生火灾,56241 部队奋战 3 个多小时,抢救出上百万元的国家财产,干部、战士有 9 名严重中毒,几十名轻度中毒。工人群众说:“当年老红军、老八路拥政爱民的传统,新一代的干部战士继承下来了”。1981 年 1 月 17 日,四川平武矿子沟林场失火,严重威胁邻近的王朗熊猫自然保护区和大片原始森林的安全。56006 部队某团按照军区命令,由副团长率领 300 余名指战员赶赴灾区,在海拔 3000 多米的高山上,同林场工人一起奋战 3 天,扑灭了森林大火。1981 年 3 月 23 日,西昌市上西街百货大楼发生火灾,凉山军分区等 8 个单位立即集中干部战士 1350 人,其中团职以上干部 113

人,营以下干部 540 人,与群众一起把火扑灭。部队有 51 人受伤,6 名重伤住院。1982 年 3 月 10 日,甘洛县乌曲歌果山森林起火,火势迅速向原始森林蔓延。56042 部队由副部队长率领,协同当地群众经过两天战斗,扑灭大火,保住了储量 100 万立方米,价值 12 亿元的巴普足原始森林。

(三)抗震救灾

四川解放后,先后发生十多次强烈地震,其中以 1973 年、1976 年、1981 年三次地震造成损失最大。每次大的地震发生,军区都迅速派出部队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帮助重建家园。1973 年 2 月 6 日,甘孜炉霍地区发生 7.9 级强烈地震。成都军区派出 6 个团、11 支医疗队、150 辆汽车救灾。共治疗伤员 5 万多人次,挖出粮食、食油 50 多万公斤,运送救灾物资 2000 余吨。航空兵某师副师长率 5 架飞机空投粮食、衣物等 36 万余公斤。震后,部队帮助修建简易民房 5000 多间,修复水渠 52 条、电站 3 座、公路 58 公里,修理农机具 2000 余台件,积肥 42 万余公斤,平整土地 7 万余亩,支援棉衣 3 万余套,毛皮鞋 1 万余双。

1976 年 8 月 16 日,松潘、平武发生 7.2 级强烈地震。成都军区于 17 日凌晨即派出 2 个团、3 个营、2 个连和 7 支医疗队参加抢救。驻川空军出动各型飞机 39 架次,空投物资 49794 公斤。

1981 年 1 月 24 日,道孚县发生 6.9 级地震。成都军区立即派出一个步兵团、一个工兵营、两支医疗队和一个汽车团,昼夜兼程赶赴灾区抢救。当地驻军 56037 部队、道孚兵站和道孚人武部,在自己受灾的情况下,也抽出力量一同抗震救灾。56037 部队在政委带领下,从废墟里救出遇险群众 100 多人。该部机炮连受灾严重,住房全部倒塌,全连有 55 人被压在下面,其中 2 人牺牲、3 人重伤、7 人窒息、32 人轻伤。但他们从废墟中爬起来,在正副指导员率领下翻越断墙残壁,跑遍大街小巷进行抢救。班长彭杰才从昏迷中醒来,不顾劝阻,同战友一起救出 4 名藏族同胞。

(四)抗旱救灾

1960 年四川大旱,驻川部队大力投入抗旱保收斗争。仅这一年的上半年,就投入劳动日 37 万个,运输车 300 辆,帮助修水库 37 座,修水渠 7.5 万米,抗旱保苗 5 千亩,抢收抢种近 10 万亩。1967 年夏,重庆、江津、涪陵、万县、达县等地发生旱灾,当地部队、军分区、人武部,全力以赴抗旱保苗抢种抢收。7788 部队除派高炮部队进行人工降雨外,该部炮兵基干团投入 2.5 万个劳动日,灌田 700 多亩,抢收抢种 1.2 万多亩。同年,川北、川南干旱,1971 年川东干旱,驻灾区部队从人力到物资进行大力支援。

四、军民共建精神文明

(一) 共治社会恶习

川陕革命根据地创立时,当地成年男子有90%吸食鸦片。通江城内约1000户人家,开设烟馆达200户。红四方面军到达后,立即进行禁烟宣传。妇女对戒烟最热心,方面军总政治部通令各部,在驻地召开妇女大会,推进戒烟工作。在通江城举行的一次妇女大会,有5000名妇女参加,有些还是从外地赶来的。在各地普遍设立戒烟所。通江县城戒烟所第一期约300人,第二期达1000余人,其中不少是母亲或妻子送来的。颁布戒烟条例。规定壮年男女必须限期戒除,50岁以上有病者可缓戒,参加红军、各级政府组织及民众团体的,必须以身作则,彻底戒绝。这些都收到良好的效果,被群众誉为红军到川北后的一件大功德。

(二) 共办文化教育

50年代以后,驻川各部队采取多种形式,支援驻地教育事业。或抽出人力、物力,帮助修建校舍,或捐款、赠物、送书,帮助解决教学用具,或派人协助提高教学质量等。有的部队还帮助驻地群众办文化夜校、文化活动室、图书室,举办科学技术普及班等,深受群众欢迎。

(三) 支援地方修建革命历史纪念馆、纪念碑

驻川部队支援、参加修建的有朱

德故居纪念馆、刘伯承元帅陈列馆、陈毅元帅故居文物陈列馆、刘伯坚烈士纪念碑及陈列室、红军巧渡金沙江纪念碑、彝海结盟纪念碑、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红军飞渡泸定桥纪念碑、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红四方面军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南江县革命历史博物馆、通江县川陕革命根据地军史陈列馆、苍溪县红军渡江纪念碑、黄继光烈士纪念馆和建于松潘县境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等。这些景点,已成为对群众进行革命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四) 共建文明单位

共建文明村、文明街 据1983年统计,成都军区有军民共建点1514个,其中有343个共建点被当地政府评为先进单位,有50个共建单位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的奖牌。四川省军区建起的286个共建点,共涌现出五好、文明家庭7213户,文明个人13919人,劳动致富、科学致富244户;转变失足青年927人。驻川空军1985~1990年间,建立共建点266个,其中有99个被地方县以上单位评为军民共建先进单位或精神文明单位。石棉县人武部同安顺场在共建活动中,把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同劳动致富相结合;开展“五好家庭”、“五好婆媳”同建立专业户、重点户相结合;开展学雷锋、学张海迪活动同帮助困难户、为邻居做好事树新风相结合。人

民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农副业生产有较大发展。原来每年有80%的农户靠政府借粮贷款渡荒。1983年,全场粮食产量达32万多公斤,人平达500多公斤,现金收入人平220元,改变了吃粮靠借、用钱靠贷的状况。56265部队与成都市岳府街开展共建,帮助街道净化、绿化、美化,维护交通秩序,建立安全卫生责任制,建立军民联防、夜间巡逻制,组织居民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树立“好邻居”、“好媳妇”、“好夫妻”标兵,举办少年文化活动站,使街道卫生有人搞、安全有人管,不文明现象有人抓,成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共建文明学校 驻川部队关心青少年的培养教育,不少单位与驻地附近学校结成共建对子。56262部队与驻地龙潭寺中心学校开展共建文明学校活动,除派出校外辅导组外,部队领导和政治处干部经常到校了解情况,帮助制订“文明执教公约”,协助整顿教师队伍,研究改进教学方法,创办“学习园地”。还发动干部战士帮助家住农村的教师种好责任田。56103部队与雅安实验小学开展共建文明学校活动,围绕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在学校开展学雷锋、学张海迪活动,学英雄、挂奖章活动;响应邓颖超提出的在少年儿童中开展创造性活动的号召,开展五小(小考察、小发明、小实验、小种植、小能手)活动;收到好的效果。学

校也派出教师,为部队开办语文基础知识、乐理等讲座,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共建文明川藏运输线 1983年初,56026部队党委,向所属部队发出开展军民共建文明川藏运输线活动的号召,并商得沿线地方有关单位同意,共同订立了“共建文明川藏运输线公约”,组成军民共建领导小组。采取“分类定点、划段承包”的办法,有固定驻地的兵站和医院,以搞好驻地军民共建为主,流动性大的汽车部队,以搞好途中的军民共建为主,同沿线的地方单位结成243个共建对子,共有400多个单位、近5万人参加。开展以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为核心,以改善交通秩序、保障安全运输、提高服务质量、转变社会风气为重点的共建活动。使交通秩序有了改观,社会风气有了好转,军政、军民、民族关系得到改善。促进了运输、接待、医疗等各项任务的完成。1983年9月,川藏两省区的交通厅和成都军区后勤部及共建单位在雅安市召开军民共建“文明川藏运输线”联系会议,相互介绍开展共建活动的情况,交流经验,研究进一步开展这一活动的措施。1984年10月,川藏两省、区和成都军区政治部在拉萨召开军民共建“文明川藏运输线”活动经验交流会,有32个先进单位受到表彰。他们的经验,被推广到川藏地区许多公路上。

创建“双拥”先进单位 80年代初,为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成都军区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组织发动全省军队和地方单位共创“双拥”先进单位活动。1983年10月,省政府和成都军区联合召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表彰了28个先进单位、409名先进个人。“双拥”活动促进了军地共建精神文明活动的深入发展。1988年,四川省军区

修订完善共建规划和措施,层层建立责任制。全省军民共建活动由军民共建发展到军警民共建,由建设文明村、文明街发展到建设文明县、文明城市,由精神文明发展到两个文明一起抓。江津县政府与驻军共建活动成绩突出,1990年,国务院民政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授予江津县“双拥模范县”称号。

